



# 钱塘潮涌尽唐诗

□黄亚洲

九百卷的《全唐诗》，外加《全唐诗逸》与《全唐诗补编》里的补充部分，目前已知唐诗达五万四千多首。这么多的唐诗里，有多少落入了我们的钱塘江中？

起码，我从钱塘江的角度来看，眼前尽是滚滚唐诗，潮头撞在堤岸上，溅开的尽是李白、杜甫、张继、岑参、白居易、贺知章的轰响。

这是“浙西唐诗之路”的轰响。

我们知道，“唐诗之路”是指唐代的一条诗人往来频繁、对唐诗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古代旅游风景线。它起自京都长安，经东都洛阳、古运河、扬州、杭州、曹娥江、剡溪、新昌天姥山、天台石梁飞瀑、温州、福建，直达岭南地区。学界通常将浙江境内的“唐诗之路”分为“浙东唐诗之路”与“浙西唐诗之路”。

我们浙江人说起钱塘江，感情之深厚，自是不消说的。钱塘江古名浙江，亦名浙江或之江，是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流域位于浙江省西部，有南、北两源，均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南源衢江，在衢州境内，古称濂水；北源为新安江。而钱塘江唐诗之路，有称“唐诗西路”的，主要就是指“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这一带。

名诗人留下的名篇当然很多，读来，满眼熠熠闪光。


他们代表性的诗作主要有：李白《古风》（其十二）、白居易《潮》、孟浩然《宿建德江》、杜牧《睦州四韵》、孟郊《送无怀道士游富春山水》、张继《题严陵钓台》、元稹《别后西陵远眺》、徐凝《观浙江涛》、孙逖《夜宿浙江》、王昌龄《浣纱女》、韦庄《桐庐县作》《南游富春江作》、贯休《秋过钱塘江》、顾非熊《经杭州》、罗隐《钱塘江潮》、方干《旅次钱塘》、吴融《富春》、姚合《杭州观潮》、刘长卿《却归睦州至七里滩下作》、章八元《新安江行》、朱庆馀《送祝秀才归衢州》等等。

这些名篇或状摹地理山川、阡陌田园，或描述政经风貌、历史文脉，我们经由他们的诗作，便能痛痛快快地领略那个时代钱塘江流域的风物和人文，满眼的青翠，满耳的鸟鸣，满心的喜悦，满腹的感慨，喜煞人也。

钱塘江流域在如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益发显得秀美无比了，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钱塘江唐诗之路”，就会油然而生“钱塘江唐诗之路依旧活着”的感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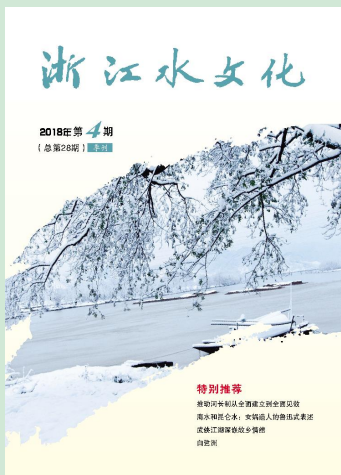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走的就是诗的道路，岂有他哉！

（作者：曾任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



# 浙江水文化

2018年第4期(总第28期)



## 卷首语 JUAN SHOU YU

1 钱塘潮涌尽唐诗

黄亚洲

## 理论前沿 LI LUN QIAN YAN

4 推动河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

鄂竞平

## 水事动态 SHUI SHI DONG TAI

7 为大花园建设串起美丽水网

——柯城区“两溪”流域治理的几点启示

省水利厅美丽河湖建设调研组

10 绍兴发布河湖长制地方标准共创美丽河湖

11 安吉:生态布局 绿色发展 美丽河湖展新态

12 浙江湖州高标准实施美丽河湖建设

## 学术论坛 XUE SHU LUN TAN

13 弘扬钱塘江海塘文化 助力拥江发展”

杨丽婷

20 从中华治水史看历代水治理体制的演变和经验

26 1930年代长江水灾与“废田还湖”问题研究

胡勇军

主 办:浙江省水利厅

承 办: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马林云

副主任:蒋如华 李 锐

成 员(按姓氏笔画):

王春来 邬杨明 江海洋

陈永明 严齐斌 张志荣

周红卫 范波芹 赵法元

宣伟丽 柴红锋 涂家焰

钱燮铭 史永安 梁国钱

葛捍东 董福平 虞开森

裘江海

# ZHEJIANG

# 目 录 CONTENTS

## 水利纪事 SHUI LI JI SHI

34 从水则碑谈古代的水文测量

涂师平

39 浙东古运河源头杭州西兴

——粉墙黛瓦唐诗韵 千年古镇续繁华

黄佳

42 寻找消失的文明

——良渚外围水利系统发现记

王宁远

## 文化鉴赏 WEN HUA JIAN SHANG

49 烟波百尺桐江好

董利荣

51 海水和昆仑水：女娲造人的鲁迅式表述

倪浓水

54 武侠江湖深嵌故乡情结

崔然

## 水韵艺海 SHUI YUN YI HAI

56 千秋通济堰

鲁晓敏

59 白鹭洲

练云伟

61 组诗

李俏红

63 经严陵钓台

唐·杜荀鹤

63 渔浦

唐·常建

## 征稿启事 ZHENG GAO QI SHI



封底

主 编:史永安

副 主 编:闫彦 顾蓓熙 蒋剑勇

责任编辑:雷水莲 叶洪明

编 辑 出 版:《浙江水文化》编辑部

内部准印证号:浙内准字第 0235 号

# SHUIWENHUA



# 推动河长制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

□ 鄂竞平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破解我国新老水问题、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大制度创新。一年多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河长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提前半年实现全面建立河长制目标，河湖管理保护进入新阶段。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政治责任、使命担当，着力解决河湖管理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推动河长制由全面建立转向全面见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全面建立河长制任务提前完成 河长制制度优势初步显现

2016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在2018年底全面建立河长制。2017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发出“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的号令。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安排部署，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担当尽责，真抓实干，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18年6月底前全部建立河长制，比中央要求的时间节点提前了半年。

一是全面实现“见河长”。截至目前，全国省、



市、县、乡四级工作方案全部印发实施,河长体系全面建立;省市县河长制办公室全部建立,配套制度全部出台。全国共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30多万名,其中省级河长402人,59名省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河长,各地还因地制宜设置村级河长(含巡河员、护河员)76万多名。

二是各级河长积极“见行动”。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主动将河湖“老大难”问题作为自己的责任田,既挂帅又出征,带动各级河长履行巡河、管河、护河、治河职责。各地针对乱围乱堵、乱占乱建、乱采乱挖、乱倒乱排等老百姓关心的河湖突出问题,积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有的集中整治非法采砂、非法码头,有的实施退圩还湖,有的开展“生态河湖行动”“清河行动”,有的开展消灭“垃圾河”“黑臭河”专项治理,收到明显成效。

三是河湖治理初步“见成效”。通过集中清理整治,一些河湖水域岸线逐步恢复,一些河湖基本消除黑臭脏现象,一些河湖水质明显提升,河畅、水清、岸绿的景象开始显现。同时,各地积极“开门治水”,推动河长制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涌现出一批党员河长、企业河长、巾帼河长、河小青、河小禹等“民间河长”,有的地方还引导成立河湖保护志愿服务组织,形成河湖管理保护合力。

### 聚焦管好“盆”和“水”

#### 推动河长制实现名实相符

当前,全面推行河长制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也要看到,河湖的许多问题具有长期性累积性,河湖管理保护中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河湖生态环境总体上尚未发生根本改观,侵占河道、围垦湖泊、非法采砂、超标排放等违法违规行为仍然禁而未绝。有了河长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让河长制充分发挥作用、切实维护河湖健康,还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解决河湖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做

好两个方面的管理保护工作:一要做好盛水的“盆”,即对河道湖泊空间及其水域岸线的管理保护;二是保护好“水”,即对河湖水资源的管理保护。下一步,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河长制的制度优势,聚焦管好“盆”和“水”,统筹加强河湖水体和岸线空间管理,维护河湖生命健康,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一要严格河湖水域及岸线管理。依法划定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实行涉河湖行为全过程监管,严禁修建围堤、建设阻水建筑物、种植高秆作物、设置拦河渔具、弃置矿渣泥土垃圾等行为,确保河湖水域面积不缩小,行洪蓄洪能力不降低,生态环境功能不削弱。严格水域岸线分区管理和用途管制,合理划分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和可开发利用区,实现岸线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二要狠抓河湖水资源节约保护。坚持节水优先,大力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强化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指标控制,严格规划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和用水定额管理,健全用水计量、水质监测和供用耗排监控体系,严控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做到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宜。结合制订“一河一策”“一湖一策”方案,开展河湖生态水量状况专项调查评价,合理确定不同来水情况下,河流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水量(流量)及湖泊、水库、地下水水位控制要求,保障河湖基本生态水量。

三要开展河湖专项整治行动。水利部已经开展了全国河湖采砂专项整治行动、水库垃圾围坝专项整治行动、长江干流岸线利用专项整治行动、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等四大专项行动。近日,又针对河湖管理存在的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清四乱”行动。各地要针对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促进河湖面貌根本改善。

四要加大日常巡查监管力度。建立河湖日常

巡查监管制度,落实河湖管理、执法、巡查、保洁等相关人员,对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处理,保持河湖畅通、堤岸整洁。科学布设河湖水量、水质、泥沙、水生态等监测站点,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及时掌握河湖及水域岸线变化情况,实行动态监管。依托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等平台,实现河湖基础数据、巡查监管情况、突发事件处理、督查考核评估等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提高河湖管理智能化水平。

###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 确保河长制各项任务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今后一段时期,是河长制由全面建立转向全面见效、实现有名有实的关键期,是向河湖管理顽疾宣战、还河湖以健康美丽的攻坚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围绕美丽河湖建设,重点加强四方面工作,确保河长制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一是压实河长责任。河长制的核心是责任制,是以党政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负责制为主的河湖管理保护责任体系。要将河长体系覆盖到老百姓认为的每一条河流,明确河长职责,压紧压实总河长对辖区内河湖管理保护的第一责任,盯住盯牢其他各级河长对相应河湖管理保护的直接责任,

健全河湖管理队伍,形成党政牵头、部门协同,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是强化督导检查。督导检查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要综合采用飞行检查、交叉检查、联合督查等方式,坚持明察暗访相结合、以暗访为主,及时深入了解各级河长履职和河湖管理保护的真实情况。对发现的突出问题,采取约谈、通报、在媒体公开曝光等方式,督促问题整改到位,推动各级河长把责任抓牢抓实。

三是严格考核问责。考核问责是压实责任的关键一招。要针对不同考核对象研究制定差异化考核办法,明确考核主体,量化考核指标,规范考核方式,强化考核结果应用,将考核结果作为地方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履职不力,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问责。

四是引导公众参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丽河湖的期盼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将河湖面貌改善、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实效的唯一标准,建立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台,发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参与监督河长制工作。持续做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让河湖管理保护意识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浓厚氛围。

(来源:人民网 2018年7月17日)

# 为大花园建设串起美丽水网

## ——柯城区“两溪”流域治理的几点启示

□省水利厅美丽河湖建设调研组

当前,我省已全面启动美丽河湖建设。未来五年,我省将围绕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加快构建具有浙江独特韵味的浙北江南诗画水乡、浙西秀丽河川公园、浙东滨海魅力水城、浙中锦绣生态廊道、海岛风情花园五大美丽河湖新格局。为了进一步推进美丽河湖建设,根据省委“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部署,调研组赴衢州市柯城区蹲点调研石梁溪和庙源溪河流治理工作。调研中,我们沿河逆流而上,先后走访了石梁镇石梁村、麻蓬村、静岩村、城西村、荞麦坞村,九华乡新宅村、妙源村、茶铺村,万田乡荷塘村等地,与基层水利干部开展座谈,与村干部、村民、投资商等进行交流。通过走访调研,我们发现开始于2014年的“两溪”流域系统治理,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通过治理,流域不但实现了防洪能力大提升、生态大变样、水岸大乐园,也实现了产业大转移、农民大增收。截至今年3月,“两溪”沿线3万多农民已实现转产转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3245元,累计增收超3亿元。“两溪”治理成为水利支撑大花园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典型范例,对我省当前深入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坚持安全第一

安全是美丽的基础,安全始终是河湖治理的第一要务。“两溪”治理前,两岸多为上世纪60年

代至70年代保留的土坝,局部是上世纪90年代至2010年之间建设的浆砌块石护堤,防洪标准不达标,堤脚防冲能力不足,冲刷严重,部分堰坝损毁破坏,沿线防汛巡查通道不畅,流域行洪安全存在较大隐患。“两溪”治理中,柯城区将保障防洪安全放在首位,对“两溪”的防洪安全进行全面系统的考虑,合理新建加固防洪堤29.25公里,加固改造堰坝34座,新建防汛巡查道路38.43公里。通过系统的堤防、护岸建设,“两溪”防洪安全全线达标,其中石梁、万田、九华集镇达20年一遇,实现流域防洪能力大提高。2014年以来,“两溪”流域先后经受住了6次洪水考验,特别是成功抵御了2017年钱塘江中上游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大洪水。

### 坚持系统治理

河湖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高位推动、系统谋划、系统治理。“两溪”治理前,流域内以生猪养殖、柑橘种植加工为主导产业,养殖废水和腐烂柑橘直排河道,导致河水黑臭,水质一度跌到劣Ⅳ类。早年采砂又导致河床千疮百孔,河流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在“两溪”治理中,柯城区委、区政府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将“两溪”治理作为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点工作,“书记一条,区长一条”

牵头统筹,从顶层设计上为“两溪”系统治理构建了体制机制保障。具体治理中,坚持从单一水利改造转向综合改造,统筹兼顾安全和生态、安全和休闲;从单一片段治理转向全流域治理,全线连片,多规合一,整体规划,确保了水利、交通、城建、环保等不同条块的涉河基础设施同规划、同建设;从单一岸下治理转向水岸同治,全力打好全流域实施生猪禁养、全流域截污纳管、全区域河道禁采、全辖区洁水养殖、全覆盖落实三级河长制等组合拳。通过水岸同治等系列措施,“两溪”水质得到全面提升。监测显示,截至今年4月,“两溪”均已达到国家Ⅱ类地表水水质,流域生态面貌大为改观。

### 坚持天人合一

每条(个)河湖都有自然体态,在河湖治理中如何使水利工程和自然环境有机融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河湖生态治理的关键。“两溪”治理制定了“以原生态河道为主,人工景观措施为辅”的原则,在水利项目设计中不截弯取直,不整平河道,不大拆大建,尽量减少涉水工程,尽量减少人为破坏,并适度为未来“留白”。在水利建设中,尽力维持河流原有形态,采取天然卵石防护、点阵式种植水生植物、根系发达维护成本低的本土植物固坡,顺应河势整理边滩、槽沟和深潭,为生物提供多样性栖息环境,恢复了河道两岸的野趣和生机。“两溪”治理中,对流域9.6万平方米的滩地滩林进行保护与修复,对原有“老堤”进行生态缓坡改造,对原有“老堰”进行“一堰一景”升级,既恢复防洪能力,保障防洪安全,又保持河道原生态,兼具休闲、健身功能,实现了人水和谐。此外,柯城还分7个片区对“两溪”实施堰坝改造和水系连通工程,共新建改造引水渠道23.7公里,新建固河小堰25座,使下村村、石梁村、祝家山等沿线6公里河道摆脱枯水期脱水的困境,形成了

山石嶙峋、一堰一景、草长莺飞、鱼翔浅底、活水绕村的自然生态景观。

### 坚持因地制宜

每条(个)河湖都有不同特点,河湖治理应避免千篇一律、过度同质化。在“两溪”治理中,柯城区根据“两溪”各自特点,因地制宜,为两条河量身打造了不同的治理方案,将庙源河流域打造成“一滩二岛多堰坝”的原生态绿带,将石梁河流域打造成“山水人文,秀水石梁”的城市后花园。同时,结合流域上、中、下游各自特点,以河道为主线,分别打造“生态旅游”“集镇休闲”“产业服务”功能区。以庙源溪为例,上游人文底蕴深厚、佛教文化源远流长,河道蜿蜒曲折、水流清澈、鱼虾成群、植物丰富、空气清新,打造为养生、嬉水、游泳等富有农家乐功能的河段;中游溪滩众多,河道水域面积大,沿线果蔬丰富,打造为健身、运动、嬉水、采摘游等休闲功能的河段;下游段与主城区接壤,产业集聚,河床红砂岩资源独特,打造为漫步、休闲、文化展示等功能的河段,丰富了大花园的美丽河湖形态。

### 坚持还河于民

只有实现还河于民才能实现人水和谐。治理前,“两溪”河道功能单一,缺乏相应配套设施,人水隔离亲水性不足,便民性不够,不能有效实现还河于民,不能满足文化、产业、管理及美好生活的发展需求,无法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两溪”治理中,柯城区精心配套亲水便民工程,将河道治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建成了13.8公里的滨水绿道,用于防汛巡查的同时,也供市民作为休闲步道和骑行道,使其成为居民的滨水休闲走廊。同时,对“两溪”26座堰坝进行特色化、生态化改造,增添堰坝亲水嬉水功能。经过综合治理,“两溪”流域上下贯通起生态骑行绿道、森林氧吧体验带、水上



回廊景观带、一堰一景风景带等多个健身休闲精品带，田园生态景观与城市公园景观实现有机融合。“两溪”治理后，流域沿线成为水岸大乐园，已举办乡土画展、围棋、马拉松、水上龙舟等各类活动 20 余次。

### 坚持工匠精神

美丽河湖建设相较于传统水利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丽河湖建设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利设计、施工人员的匠心和突破。“两溪”治理中，水利建设者们通过挖掘历史文化、结合现代文化提升河道水利工程内涵品位。1940 年，作家金庸曾在石梁镇求学一年有余，后来创作小说《碧血剑》中的“石梁帮”就源于此，棍技和拳术也以“两溪”沿线麻蓬村的“十三太保拳”等为原型。以

此为契机，石梁河流域设置了金庸文化广场、武术造型文化墙等文化景观，同时深入挖掘堰坝历史，将堰坝造型与历史典故相结合，形成司马堰、海龙堰等 10 座特色堰坝，组成“一带一道十八景”的整体布局，流域历史文化不断彰显。在“两溪”治理中，项目业主还根据河流实际，大胆设想，提出需求，设计方对设计方案进行反复推敲、对设计人员实施走出去大规模培训，对突破传统的设计给予足够的创新空间。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精益求精，小到对一块堰坝的叠石该如何摆放，也要进行反复推敲，对不满意的工程宁可费时费力推倒重来，体现了优秀的水利工匠精神，最终呈现出美丽河湖的“两溪”样本。

(来源：浙江日报 2018 年 10 月 12 日)



绿色骑行 周湘/摄



□记者 高驰弘 施力维 通讯员 潘琦

9月27日,绍兴市发布《河长制工作规范地方标准》和《湖长制工作规范地方标准》(以下简称“两个标准”),对河长和湖长的管理要求、工作职责和内容、巡查要求等事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界定和明确。

今后,这两个标准成为绍兴各级河湖长履行职责的行为规范和操作标准。绍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域内河网密布。全市共有河流6759条,总长度10887公里;总水域面积642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7.76%。其中中心城区水域面积达14.7%。丰富的水域资源也使得绍兴的产业偏水度高,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占据相当分量,由此带来的水环境治理任务十分繁重。

2012年,绍兴市政府出台《关于在绍兴市区主要河道实施“河长制”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市区二环内49条主要河道采取“河长制”管理,成为浙江最早出现的“河长制”管理模式。目前,绍兴共有市、县、镇、村四级河湖长11276名,实现了河湖长在绍兴水域的全覆盖。

“两个标准”设置了具体的河湖长职责和工作内容,包括省、市、县、乡、村五级体系,鼓励公众参与,鼓励设置民间河湖长;同时,不管是河长还是湖长都要设置相应一级的河道警长,对“一河一策”“一湖一策”“一源一策”及“污水零直排区”作出明确要求。

(来源:浙江日报 2018年9月28日)



# 安吉:生态布局 绿色发展 美丽河湖展新态

安吉地处浙江西北部,境内共有河道 1546.3 公里,水库 83 座,主流长 50.2 公里。近年来,安吉县以习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方针为指引,以“多规融合、水岸同治、治水惠民、人水和谐”的理念推进美丽河湖治理工作,努力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有机融合、和谐共生,打造具有安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产业带和生态区域。今年安吉共建 5 条美丽河湖,195 个美丽库塘,目前已完成 80%。

一是水岸共治、多规融合,水陆空间全覆盖。实现多规融合水岸同治,强化水利工程规划、美丽乡村规划、最美县域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等各类规划的衔接,确保保护性空间、开发边界、水资源保护红线、生态红线等重要空间参数一致。统筹谋划水、滩、岸、坡综合治理。在西苕溪上游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营造防护林 19 万亩,并将数万公顷林地划为生态公益林,5 年内禁伐天然阔叶林,严控林木采伐量,建设绿色生态屏障,改善两岸生态环境。通过全流域畜禽禁养、砂石禁采、截污纳管覆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矿山复绿等手段实现水岸同治。实现河湖沿岸家禽零养殖,关停采矿企业 6 家,垃圾分类行政村全覆盖,垃圾不落地试点村 128 个,农村生活污水截污纳管全覆盖。

二是科学治理、生态优先,人鱼虾蟹共和谐。注重高标准设计,城区河道防洪标准提高到 50 年一遇,集镇防洪标准提高到 20 年一遇,农村河道防洪标准普遍提高到 5-10 年一遇,极大改善了河道防洪抗灾能力。注重新技术应用,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及多种断面形式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式。应用生态球、松木桩,加强生态护坡,建设生态堰坝,改善鱼类洄游通道,打造绿色生态河道。注重高颜值提升,将河道建设与安吉县最美县域建设相结合,在确保行洪安全的前提下,着重打造水景观,改善水环境,提升水生

态,建设便民亲水平台,形成沿岸居民休闲娱乐与民生保障的新风景线。

三是文化搭台、串点成线,绿色长廊巧构建。在保障河道和水库原有灌溉供水功能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对河道、水库进行特色化改造。打造水库精品观光带。选取县城周边交通便利、特色鲜明的大青坞、天山坞等 9 座水库为试点,融入市政景观设计,行成一库一景的绿色长廊。打造西苕溪生态绿廊,在苕溪整治的基础上,利用沿线的村庄原生态景观构建起休息区、观赏区,挖掘、修缮、保留了西苕溪文化古迹、摆渡码头等历史印记,将两岸田园风光、名胜古迹以及美丽乡村等串点成线、成面,打造成为生态绿廊和梦里水乡。打造苕河流域绿色纽带,按照生态、生活、生产对 303 平方公里苕河流域进行布局,划定自然保护、生态修护和综合开发三个区,打造人水和谐发展格局。

四是产业富村、治水惠民,水运经济促发展。在保护水资源的基础上,以优美的水系环境发展水旅游、带动水产业,谋求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使水系发展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经济带,成为当地人民致富的产业带。利用水利生态和文化等资源,打造生态休闲水旅游品牌,引导当地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精品民俗、观光园等产业,让游客流连在美好的水环境景致之中。打造荆湾、景溪、禹山坞等多个水生态、文化、休闲精品项目,累计投资 30 亿元。其中,荆湾村打造“滨水乡村休闲带”,建设村文化礼堂、河滨商业街、码头广场等项目,行成“水绕村、村环水”美景,投资 8 千万元的“溪上桃源”农业园区项目在荆湾村初见雏形。全年村集体经济经常性收入达 143.4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3.1 万元,分别实现三年增长翻一番,为乡村振兴提供“荆湾样本”。

(来源:浙江水利网 2018 年 9 月 19 日)

# 浙江湖州高标准实施美丽河湖建设



初秋,连片成群、串点成带的德清县新安镇舍北村沿河而建的文化场所,吸引了大批城里来的游客。村党总支书记钱建坤说,经过水利部门的治理,断头河、臭水浜打通了,死水变成了活水,河道变美了,舍北村还成功晋级为浙江省 A 级景区。舍北村的变化,正是湖州市高标准建设美丽河湖的缩影。

近年,湖州市抓住浙江深入推进“五水共治”等行动的机遇,高标准、高起步、科学治理骨干河道,水生态环境日渐好转。

适度提高生态建设标准。已建成的罗溇港生态示范段环湖河道整治工程绿化标准为每公里 100 万元,比其他标段高了 60 万元,建成后景观面貌明显提升。苕溪清水入湖河道整治工程新增了乌象坝生态湿地、东苕溪绿道工程,为群众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同时深入挖掘沿线的溇港文化、运河文化、苕溪文化和治太文化等,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水文化展示项目。太湖溇港更是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高标准带来高品质。湖州市出台水工程生态建设技术规范,明确河道生态建设相关要求,指

导实施全国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重点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建成了一批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生态示范河道,先后有南浔区车家兜港、德清县刘家桥港、安吉县浒溪、长兴县合溪新港等 17 条河道被省水利厅评为省河道生态建设示范工程。

各县区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开展农村河道连片整治,高标准打造水环境优美村。德清二都防风小镇、水梦苕溪景观线、洛舍镇三家村港等河道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融入水利文化,建成一个个滨湖公园、一条条美丽河道。吴兴区突出杨溇、义皋古村美丽河道建设,打造了义皋古村长约 1.2 公里的南运河景观带,以“蔬香香杨溇”理念打造了杨溇村约 20 公里的绕村文化景观带。

湖州市将继续围绕“浙北诗画江南水乡”定位,依托“双溪汇湖,城水相依”自然风貌,构建“清丽苕溪、魅力湖漾、古韵溇港、诗画水乡”格局,重点打造“一湖、十漾、百库、千河、万景”,力争到 2022 年建成水文化展示馆示范园 5 个,创建省级美丽河湖 10 条、市级美丽生态河道 1000 条。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18 年 9 月 21 日)



# 弘扬 钱塘江海塘文化 助力“拥江发展”



□杨丽婷

杭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南沿和钱塘江流域,西部属浙西丘陵区,背靠天目山莫干山,东部面临东海,区内总体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湖泊密布,物产丰富,可谓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地。自秦朝设县治以来,至成为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再到今天后 G20 年代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会,杭州城市的发展正在迈向一个更加广阔深远的新时代。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杭州市委城市工作会议暨地铁建设五年攻坚行动动员大会上,市委书记赵一德提出了“实施拥江发展战略”的倡议,这一倡议具有深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 一、钱塘江对杭州城市发展的促进与阻碍

首先,城市空间是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运行载体,相对宽阔的城市空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反之,则会限制城市的发展。杭州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与钱塘江密不可分。

五六千年前,越人的祖先就在钱塘江河口两岸凭藉临江滨海的水土之利,开创了越文化。包括今浙江在内的东南地区被大海所阻隔,区内多山地丘陵,平原面积狭小且湖沼密布。而当时的在此定居的先民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生产力低

下的火耕水耨式水稻种植无法保障充足的食物来源。因此,他们利用本区内水生动植物种类繁多的特点,捕捞水生动植物,以维持生计。正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砮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此时期该区域内包括城市在内的各种文化发展均不及当时的黄河流域。到战国时期的公元前 222 年,秦国才开始在今杭州设钱唐县、余杭县。

及至西晋,中原乱起,大批人员为避战祸南迁,号为永嘉南迁。由于长江流域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的宁绍平原拥有安定的环境及丰富的资源,多数南迁家族定居于此,为该区域的开发添增劳力,同时带来了当时黄河流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经东晋时期、南朝时期二百余年的开发,不但农业生产有长足进步,还带动了纺织、冶铁、造船、交通运输及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在隋代南北大运河开凿之前的长时期内,钱塘江是杭州最初兴起的主导因素,同时由于交通条件始终限制着城市与钱塘江两岸间的交流,城市呈以钱塘江沿岸为依托的原生态天然廊道空间形态。

隋代开凿南北大运河,因钱塘江通江连海的

航运功能,遂在凤凰山下的柳浦依山建立杭州州城,将大运河南端点设置于此,使杭州成为四方水运的中转枢纽城市。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与运行发展,加上钱塘江沿岸的自然条件在古代不适宜城市用地布局等原因,在钱塘江、西湖、运河及吴山四个主要地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杭州城成为以西湖为中心的发展势态。随后发展中,受“同心圆机制”的激励和钱塘江天堑的约束,杭州城区的扩张职能向东西两侧展开。

城市空间形态,在城市发展早期,通常较多地受到地形的约束。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地形约束将有所弱化,这时,受道路管线最短化,以及出行半径最小化的约束和激励,城市扩展具有成为同心圆的内在动力机制。近现代以来,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随着钱塘江两岸防洪大堤和跨江交通的建设,钱塘江的航运功能和旅游功能日益增强,钱塘江天堑已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城市空间扩展进一步出现了不断增强的新的动力,先后实施了“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等战略。向东的扩展,推动工业发展;向西的扩展,推动住宅建设。直接动力是杭州城市行政区划的扩张。在沿江开发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用地需要以后,继续向南的扩展实行“跨江发展”。1996年,杭州市在萧山的西兴等乡镇基础上设立了滨江区,实现了跨江发展。这一带最初以工业为主,但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用地条件,目前已成为浙江省产业层次最高的一个区域,同时房地产业发展也较快。城市空间的拓展,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口集聚,也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杭州的城市空间,在先后实施了“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等战略后,又一次迎来了新的发展平台。实施“拥江发展战略”,就是以杭州境内 235 公里钱塘江为主轴,打造“沿江开

发、跨江发展”升级版,实现跨江发展向拥江发展的大跨越。拥江发展,把钱塘江打造成一条生态带、景观带、旅游带、产业带,把钱塘江变成杭州“市内的江”、“城中的江”。历史上,杭州城市发展格局主要依西湖而建,城市格局相对较小。进入本世纪初,杭州提出“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城市发展战略。

## 二、钱塘江海潮对沿岸人民的影响与历代钱塘江海塘的修筑

“拥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早有先例,纵观世界知名城市,许多城市把江河海岸线作为发展轴。伦敦的泰晤士河,河流水量稳定,冬季流量较大,很少结冰,通航里程 280 公里,海轮可乘海潮直抵伦敦(距河口 88 公里)。由于河口濒临北海和大西洋,每逢海潮上涨,潮水顺着漏斗形的河口咆哮而入,一直上溯到伦敦以上很远的地方。人们为了防止涌潮淹没伦敦,在伦敦桥下游 13 公里处,兴建了技术复杂、耗资巨大的泰晤士河拦潮闸工程。巴黎的塞纳河,从巴黎盆地东南流向西北,到盆地中部平坦地区,流速减缓,形成曲河,流经巴黎市区长度约 13 公里,从东往西转了个大弯弧,把巴黎分为两半。塞纳河在上游水流平缓,有“安详的姑娘”之称。巴黎人称之为“慈爱的母亲,说“巴黎是塞纳河的女儿”。上海的黄浦江则直通东海,各国船只可以越洋通过黄浦江进入中国,是中国由上海通向世界的水道。自 100 多年前开埠以来,黄浦江文化就彰显出中西合璧的文化开放态势,上海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港口之一。

这些江河先天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钱塘江与这些江河同样具有“通向世界的水道”这一共性,这些著名城市的“拥江发展”模式值得借鉴。同时,

由于钱塘江区别于其他城市河流的特殊地形,使得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城市的发展方法。

杭州濒临东海,经常遭受风潮侵袭,并且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外出海口江面宽达 100 km,往西到澉浦,江面骤缩到 20 km,至海宁盐官镇一带时,江面只有 3 km 宽。这一特殊的漏斗海湾,使得起潮时吞进大量海水向西逆流,而越往西江面迅速收缩变窄变浅,夺路上涌的潮水一拥而上,就掀起了高耸的巨涛,严重者可酿成潮灾摧毁沿岸庄田,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从图一钱塘江入海口与黄浦江入海口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地形上的差异,海潮对于杭州的威胁要远远大于上海。



大自然的伟力造就了天下独有的钱塘江涌潮,海潮的涨落虽然给钱塘江的风景带来了雄伟绚丽的色彩,但却常常给沿岸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特别是大潮与台风同时过境时期,风助潮势,形成暴潮巨浪,“势如倒海,声同雷震”,奔腾的怒涛铺天盖地而来,对沿海一带往往造成毁灭性的祸害。史书记载杭州潮灾的危害记载可谓连篇累牍,其灾次之频繁,灾情之严重,都是十分惊人的。如,唐大历十年(775)七月十二日,“杭州大风,海水翻长潮,飘荡州郭五千余家,船干余只,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数百人。”康熙二十九年(1682)七月二十三日,“大风雨,二十九日……海啸,山飞,平地水骤高二丈余,人民溺死无算。”

千百年来,为抗拒大潮入侵,当地人民在河口两岸修筑了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我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的钱塘江海塘。所谓海塘,即是沿海岸以块石或条石等砌筑成陡墙形势的挡潮、防浪的海

堤,实际上是人工修建的挡潮堤坝。从东汉到明代,钱江两岸百姓修堤筑塘从未间断,从用版筑法夯实的土塘,到柴土混合、以柔克刚的柴塘,到全条石砌筑的石塘,海塘结构亦日臻完善。从东汉到明代近千年的探索和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清代时,政府开始组织大规模修筑海塘,并陆续完善日常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把我国古代海塘工程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清代兴修的海塘工程中,浙江的海塘修筑活动最为频繁,规模也最大。统计有清一代的历次海塘修筑可以发现:全国较大的海塘修筑活动共计 385 次,其中在浙江沿海就有 183 次,即占全国之半;总计修旧和新建土、石海塘 3544 里,其中浙江 1545 里,占全国亦近半。



尽管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加高加固修缮钱塘江海塘的御潮体系,限于财力和物力,海塘总体防御能力偏低,因而频遭台风暴潮破坏。1994 年的“9417”号和 1997 年“9711”号两次的强台风在浙江省登陆,毁坏当地海塘 1300 多公里,直接经济损失 300 多亿元。为了提高海塘防台潮能力,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浙江省委、省政府痛定思痛,作出了“全民动员兴水利,万众一心修海塘”的决定。决心用三到四年时间,投资 50 亿元,把防御能力偏低的 1000 公里重要海塘建设成高标准海塘。这一决定深得民心,自 1997 年 10 月以来,沿海各级党委、政府把建设标准海塘作为为民造福的德政工程来抓,在沿海地区掀起了兴建



高标准海塘的热潮。到 2000 年 12 月底,基本建成标准海塘 1020 公里,完成土方 2925 万立方米、石方 2890 万立方米、砼 404 万立方米。通过三年大规模的海塘建设,大大提高了我省沿海 1000 公里重要海塘的防台御潮能力,基本解除了历来困扰当地人民群众的台风大潮灾患,同时给我省沿海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标准海塘建设成效十分显著。

可以说钱塘江海塘对杭州而言,是守护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坚强卫士,杭州城市要“拥江发展”,必须继续保持对钱塘江涌潮的控制,使其不再成为杭州“拥江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纵观钱塘江海塘从古到今的发展,我们可以肯定,海塘不仅捍卫了杭州城,同时,还直接保护杭嘉湖平原和萧绍平原 1000 万亩耕地和 1000 万人口(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生产要素高度聚集,经济发达,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占全省 80 %以上),保障了宋代以来国家财赋的积累,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钱塘江海塘不仅是沿岸地区的生命线、生存线和幸福线,而且是关系到杭州市乃至全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屏障,杭州城市要“拥江发展”,必须继续保持对钱塘江海塘的建设、管理和利用,深入挖掘钱塘江海塘的文化内涵,弘扬钱塘江海塘文化,充分发挥其作用,助力杭州市“拥江发展”。

### 三、钱塘江海塘文化的内涵

历史悠久的钱塘江海塘,是历代沿岸居民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创造的堤岸工程,它规模宏大、技术精湛,是古代治水工程的又一伟大创举,是历代先民治水智慧的结晶。在历代先民与涌潮做斗争建设钱塘江海塘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钱塘江海塘文化体系。钱塘江出海口

的涌潮,诞生了钱塘江海塘及其衍生出的各种文化遗产,使得钱塘江及其沿岸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空间,成为一个这是一个经过许多人所认可的、约定俗成的,定期定时举行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文化活动的场所。

#### (一)钱塘江海塘工程文化

钱塘江海塘工程与长城、运河并称我国古代三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较高的工程技术水平。近 2000 年来,钱塘江沿岸先民与涌潮作坚毅不懈的斗争,根据沿岸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创造出了不同规格、不同结构的海塘型式和丰富多样的护塘防冲措施。至今沿岸各地保留有不少古代海塘遗址。目前杭州市内的明清古海塘的遗存主要位于江北段,大致西起西湖区转塘街道狮子口村,经梵村、闸口、南星桥、碑亭边,再沿秋涛路、杭海路一直到九堡、乔司,并与海宁段相接。而 1997 年开始的钱塘江标准海塘建设,建成 169.4 公里高标准的海塘,则犹如“水上长城”一般巍然屹立于钱塘江下游两岸。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海塘,是从古至今发展中的钱塘江海塘文化的承载实体,是钱塘江海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钱塘江海塘观潮文化

倘若只有自然景观而没有人的参与,则谈不上是一种文化,而钱塘江海塘自诞生之初就是人与自然互动而产生的,其文化属性源远流长。大自然的伟力造就了天下独有的钱塘江涌潮,而沿岸人民则利用自然创造了多种多样的钱塘江文化。钱塘江观潮文化由来已久,唐宋时期浙江钱塘已成为观潮胜地。南宋迁都临安后,观潮活动一度风靡,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都要举行观潮盛典。迎潮前有水军演习,潮到时又有吴地少年弄潮争标表演,从达官显贵到民间百姓无不出动,万人空巷,十分热闹。正如南宋周密在《观潮》一文中所说:“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



也。”明朝的冯梦龙将“钱塘观潮”誉为“天下四绝”之一。

谈到钱塘江海塘观潮文化，不得不提的是其衍生的一种亚文化——弄潮。弄潮，是一种古老的竞技类民俗。其最早记载见于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即是深谙水性的“弄潮儿”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洒水、踏浪，表演技艺，类似于今天西方流行的冲浪运动而又有所区别。

### （三）钱塘江海塘古籍文献及诗词

#### ◆古籍文献

古代钱塘江沿岸先民在创造海塘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海塘历史文献，他们记载了千百年来先民们同狂潮巨澜的英勇搏斗，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作为现代海塘建筑的借鉴，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这些古籍文献充分反映了古代的先民利用自然资源进行改造、征服自然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古代的先民聪明才智。不同时期海塘的兴建、毁损、重修曲折的过程，江河中许多古代海塘设施彰显着文明与科学，海塘文化反映了先贤安国兴邦的胆识。而这些历史的记忆保留在一部部海塘古籍中。自唐宋至明清，历史上有几十部古海塘历史巨著，如《海塘录》、《海塘揽要》、《海塘新志》、《敕修两浙海塘通志》、《海塘新案》、《海塘考》、《太镇海塘纪略》、《江苏海塘新志》等。这些古籍内容之丰、角度之广、观点之新、意义之大，诠释海塘治水思想、治水制度、治水工程等，充分反映了先人利用自然资源进行改造、征服自然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在对江河利用方面，从工程规划到建筑，则体现出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以及其随自然环境发展的不断完善。

#### ◆诗歌

历代文人墨客在经过钱塘江海塘，一睹天下

奇观后，留下了千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潮》诗曰：“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李白在《横江词》中写道：“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杜甫诗曰：“天地黯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这些诗词绘声绘色地咏颂出钱江潮的波澜壮阔，可谓是千余年来对钱江潮的“摄影录音”。同时，描绘观潮的风俗习惯，也是古代钱塘江诗词的主题之一。此外，不少诗人针对观潮胜地的人文景观借景抒怀。海塘及其他相关观潮胜地，都曾经成为启发诗人的缪斯，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怀交相辉映。

而同时，眼见潮灾对钱塘江沿岸的摧毁，不少古代诗人对此发过感叹，同时表达过“安澜”的愿望。明代诗人陈确在《江塘叹》中写道：“海国风潮最可怜，田庐宛转越江边。鱼鳖寻常游港市，蛟螭顷刻变山川。”明人魏骥在《筑堤谣》写道：“天吴苦作孽，坏此长江堤。沃壤变斥卤，平地成深池。况值天雨雪，正及农兴时。凶年转丰岁，须在人维持。”清代海宁人查慎行在《海塘叹》中写道：“沙崩岸坍风驾潮，潮头势与城争高。愚公移山或可障，精卫填石诚徒劳。海若东来神鬼泣，尾闾南泄鱼龙逃。邑兴大役官乏费，行矣板筑须时操。”不少诗人发出感慨：只有持续不断修建海塘，方可保钱塘江两岸百姓乐享安澜。

历代的咏钱江海塘海潮诗词，是钱塘江海塘文化，也是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一座宝库。

### （四）钱塘江海塘民俗文化

如果说钱塘江海塘是沿岸居民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直接物质体现，那么海神崇拜、海塘号子、镇潮等一系列民俗活动则是沿岸人民在寻求抵御潮灾的过程中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物。

#### ◆海塘号子

海塘号子，是修筑海塘时塘工们一边干活一

边集体哼唱的鼓舞士气的一种民间音乐。至迟到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在修筑海塘的工地上还随处可以听到雄壮的号子声。《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曾收录笔者 70 年代在海盐采集的八种海塘号子,分别是撬石、翻石、打夯、龙门桩、飞碓、长杠、短杠、串步。这些号子用来配合不同形式的劳动,届时一呼众应、气势豪迈、振奋人心,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 ◆海神崇拜

《浙江通志》的祠祀卷中列举了几十位民间所崇拜供奉的神灵,其中许多神灵,如静安公张夏、转运使判官黄恕、护国佑民永同土地彭文骥、乌守忠、明宁江伯汤绍恩等,都是曾经为修建江堤海塘而作出过贡献,死后又被祀奉为神的。如唐代筑堤的石瑰,曾带领民众筑堤捍海潮,功未就,死于海。后官方为其立庙,封为潮王,庙称“石姥祠”,又称“潮王庙”,至今,杭州市区还有潮王路、潮王桥、潮王庙等遗迹可寻。正如《礼记·祭法》中所说的“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人们设庙供奉为修建江堤海塘而作出过贡献的先贤,正是出于对先贤的感念。

#### ◆镇潮

在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古代,为了抵御潮灾,除了修筑海塘以“尽人事”以外,不得乞求神灵的“天命”,希望借神灵的力量来抵御潮灾。钱塘江镇潮的民俗大致有铁牛镇海与造塔镇潮两种。

传说秦代李冰曾作石犀五座“以厌水精”,此为铁牛镇海之原型。清雍正八年(1730),铸铁牛 5 座,分置海塘各处,上刻铭文:“惟金克木蛟龙藏,惟土制水龟蛇降,铸犀作镇奠宁塘,安澜永庆报圣皇”。乾隆年间又先后铸铁牛 10 座,分置沿海塘一带。民间又有祭牛烧香的种种习俗,希望铁牛能镇住海妖,护佑安澜。这些镇海铁牛一度遗失,1987 年,当地重铸铁牛 2 座,分置盐官占鳌塔东西两

侧,作为一种历史纪念。

此外,造塔镇潮在古代也被认为是抵御潮灾的一种办法,人们相信“宝塔镇妖”,在钱塘江出海口建造的宝塔往往出于镇潮的期望。例如建于明万历四十年的海宁盐官占鳌塔,取名“占鳌”,即为镇住兴风作浪的鳌鱼之意,借此希望保障海塘的安全。

如今,海塘号子、海神崇拜、镇潮等民间习俗都已经成为历史,但由此而留下的一些文化纪念物,以及其反映的民间意识值得我们挖掘研究。

## 四、弘扬钱塘江海塘文化, 助力“拥江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城市独特魅力需要凭借特色文化来展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也一定是一座有文化底蕴、有鲜明个性的城市。塑造杭州城市特色风貌,要抓文化形象、抓文化精神,注重保护传承、注重创新发展、注重交流传播,不断厚植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和优势。历史上,西湖是杭州城市的中心,正因为有了对西湖的持续保护和人文西湖的建设,才有了现在的“人间天堂”。而在杭州城市需要拓宽发展空间实现拥江发展的今天,杭州城市要“拥江发展”,必须继续保持对钱塘江海塘的建设、管理和利用,深入挖掘钱塘江海塘的文化内涵。弘扬钱塘江海塘文化,充分发挥其作用,对推动杭州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保护钱塘江海塘文化遗产,依靠申遗推动保护工作

古代钱塘江海塘在不少地方仍有遗迹,如钱塘江海塘(余杭段)、吴越钱氏海塘、明清钱塘江海塘、北海塘、西江塘等,有些已先后被公布为文保单位(点),有些则仍需要加大保护力度。以申遗推动保护是杭州一条重要的经验,目前杭州共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8 处,世界文化遗产 2 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8 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3 个。申遗不但提高了杭州的知名度,也提高了杭州全方位的竞争力和杭州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在此背景下,保护钱塘江海塘文化遗产,依靠申遗推动保护工作,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二)海塘古籍文献、海塘诗词集整理,深入开展钱塘江海塘文化研究

古代海塘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对历史上遗存的海塘古籍资料加以整理研究,对弘扬钱塘江海塘文化大有帮助。

2017 年,钱塘江文化研究会成立了,成为研究钱塘江相关文化的重镇,深入开展钱塘江海塘文化研究,挖掘加强钱塘江海塘文化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机。目前,许多单位已经开始了海塘古籍文献的整理。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水文化研究所闫彦教授等人完成的《道光朝东西两防海塘全纪》入选 2015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但是仍有大量的海塘文献和海塘诗词有待整理。除此之外,深入开展钱塘江海塘文化研究,丰富钱塘江海塘文化的内涵,也是弘扬钱塘江海塘文化的重要途径。

(三)建设钱塘江海塘文化长廊,宣传钱塘江海塘文化精神

目前,海宁是弘扬钱塘江海塘文化工作的前线,可以作为钱塘江海塘文化长廊建设的参考。盐官海塘是海宁海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坐落在举世闻名的海宁潮观潮胜地。目前尚有占鳌塔、中山亭、天风海涛亭等文物古迹及古朴树一株。新建

造有白石台、毛泽东诗碑亭及铁牛两座。1989 年 12 月,将占鳌塔为中心,东西各为 500 米和 600 米的盐官海塘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国家投巨资进行标准海塘建设,在鱼鳞石塘外打水泥桩加固,二塘塘面进行改造。目前海塘内辟为观潮胜地公园,新建多处观潮楼、观潮台。2001 年 5 月,盐官海塘及海神庙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萧山的钱江观潮城被誉为“中国潮都”,是观潮的绝佳胜景,中央电视台数次在此取景直播钱江潮涌。若能在此,或者某一钱塘江海塘遗址上打造塘江海塘文化长廊,陈列钱塘江海塘工程、海塘诗词等文化要素,将钱塘江观潮复原发展为定期举办的活动,将昔日钱塘弄潮发展成为一种钱塘江特有的体育项目,将海塘号子用舞台演唱的形式定期表演,这一系列的活动则将使杭州的钱塘江增添一层文化底蕴。

作为保护杭州城安澜的钱塘江海塘,是当地居民赖以发展的重要工程,然而却鲜为人知,建设钱塘江海塘文化长廊,宣传钱塘江海塘文化精神,有利于提升钱塘江对与杭州城的文化辨识度,有利于使钱塘江在杭州发展的“钱塘江时代”取代西湖,成为杭州城市的名片,使杭州城逐渐摆脱“西湖时代”偏安一隅的桎梏,拥抱更为广阔的“钱塘江时代”。

(作者: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水文化与水资源经济研究所 博士 讲师)



# 从中华治水史看历代水治理体制的演变和经验



三峡工程

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中华民族有着善治水的优良传统,在几千年治水实践中积累沉淀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对当代治国理政和治水兴水有重要借鉴意义。面对新老水问题相互交织的水安全形势,须凝练和汲取治水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建立与当前水安全形势相适应的水治理体制。

## 一、特殊的国情水情决定了治水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国自古就是治水大国,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治水史,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水情所决定的。

(一)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赋予了水利特殊地位

受大陆季风影响,我国降水空间差异大,年内年际变化大。水资源南多北少、东多西少。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摇篮。治水实践孕育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

我国是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建国前 2155 年间,中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 1092 次,较大的旱灾 1056 次,水害几乎每年发生。黄河在历史上曾决口泛滥 1500 多次,大的改道 26 次,平均每 3 年有一次决口,每 100 年有一次大改道。旱灾给中华文明和人口损失造成的破坏,要远高于其他自然灾害。



大禹治水

华夏农耕文明高度依赖灌溉。年降水 400mm 等值线可将我国划分为西北部和东南部,西北部降水稀少,没有灌溉就没有稳定的农业。东南部降水过程与农作物生长需水过程不完全同步,灌溉是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必要措施。几千年来,通过兴修水利,治理江河,人们逐渐在平原地区居住,进而开拓疆土、繁衍人口、发展经济、推进社会进步。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建设使水旱灾害区变为沃野千里的粮食供应基地和基本经济区,奠定了古代王朝和农耕文明的基础。“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深刻阐明了治水、农业生产与国家经济进而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





漕运

漕运是沟通南北政治经济的重要纽带。我国封建王朝的都城大多坐落于北方，隋唐至近代以来长江流域成为基本经济区，建设南北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运输体系成为历史必然，而当时解决运输的最佳途径则是开凿大运河，通过漕运保障都城的经济供给。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运兴衰成为社会政治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我国一大批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内河航运发展起来的。运河沿岸原有的城市如扬州、南京、苏州、杭州、北京等更加繁荣，天津、淮安、徐州、济宁等城市亦因河而兴，这些城市通过运河将城市文明辐射到四面八方，对中华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二) 历代善治国者均以治水为重

圣人治世，其枢在水。大禹治水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清朝的康熙、乾隆，每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把发展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重点。



郑国渠

秦始皇修郑国渠而灭六国终成霸业。秦始皇兴建引泾灌溉工程郑国渠，历经十年完工。“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日益富强起来的秦国，逐个消灭了其他诸侯，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

汉武帝刘彻曾在奏章批阅中深刻阐明兴修水利的思想。汉武帝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之策，许多治水能匠和大臣都纷纷上书，陈述治水方略。水利建设空前繁荣昌盛，白渠、六辅渠、关中漕渠、褒斜运河等水利工程建成并发挥了巨大效益。

唐太宗李世民以水的哲理举一反三治国安邦，告戒臣民“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唐太宗即位之初，面对黄河流域水旱连发、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的局面，治理黄河水患、修筑海堤，建设了许多治河工程，复苏经济，开创了国强民殷的“贞观之治”。



它山堰

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水利得到重大发展。康熙皇帝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大事，夙夜靡念，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足见治水在当时国家治理中所处的地位。

(三) 治水兴衰一定程度影响了国家兴盛与政权更替

治水促进了我国古代基本经济区建设。治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一定意义上推进了中国古代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制的发展。治水促进了国土开发和人口增长，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开发使全国人口从 2000 万增至 5000 万，关中灌区土地只

有全国的 1/3, 财富却为全国的 60%; 唐朝时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得到大规模开发, 修建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长江流域取得基本经济区地位, 全国人口发展到近亿。



大运河

治水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疆土开拓。秦代以来建立的屯田垦殖制度, 为巩固边防、推进边疆民族地区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发展大运河, 沟通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 对打破地区、民族间封闭的壁垒, 促进各民族融合特别是文化认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治水不力往往导致政权衰亡和王朝更替。许多封建王朝引治水不力, 影响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 如果再遭遇大的水旱灾害, 饥馑与繁重的徭役往往激起社会矛盾与动荡。唐末因旱灾引发黄巢起义导致政权衰败。元末黄河泛滥, 繁重的河工徭役导致农民起义。明末崇祯大旱引发饥荒, 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农民起义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导致明朝灭亡。西汉末年绿林军与赤眉军起义、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宋代方腊起义都与水旱灾害严重、治水不力密切相关。



西汉末年绿林军与赤眉军起义

## 二、水治理任务和体制 伴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

从夏商周开始, 各历史时期水治理的重点任务, 随社会发展需求的不同而不同, 水治理体制随之发生演变。

### (一) 古代的水治理任务和体制

古代水治理以防洪、灌溉、漕运最为重要。远古时期禹率领开展大规模治水活动, 开启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水治理体制。其后历朝历代防洪建设从未间断, 东汉王景修筑黄河堤防, 经历 800 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改道与决口。北宋黄河又开始频繁决口, 治河防洪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期长江干流中游的商业和交通重镇亦开始筑堤。黄河于南宋年间开始夺淮入海 700 年间, 与淮河、长江相互纠结, 带来巨大防洪问题。明清两代治河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超过以往任何朝代, 清代河工经费一度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 1/8 至 1/6。

商周时期实行井田制, 灌溉开始得到国家重视。春秋战国时期, 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 各诸侯国普遍重视修建引水灌溉工程, 其中以秦国的郑国渠和都江堰、魏国的引漳十二渠和楚国的芍陂最为著名。秦国的强大与大兴水利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隋唐宋时期, 农田水利取得长足发展, 长江中下游及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日渐发展, 始建于秦汉时期的河套平原引黄灌区、岷江流域的都江堰等灌排工程体系等都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 珠江流域发展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经济区, 围田与基围发展迅速, 有效扩大了耕种面积。

春秋战国时期, 出于战争运输兵饷的需要, 各诸侯国普遍重视开凿运河。隋朝开凿运河, 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系在一个水运网中。唐、宋以及五代期间, 南北大运河成为各王朝都城的生命线。元代定都北京后, 在南北





都江堰

大运河基础上开凿京杭大运河，使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连接起来。明清时期“国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河务之要是“治河保漕”。

中国历代都在中央机构中设置管理水利的部门、职官。秦汉以来历代均在中央设置有水行政管理机构。隋唐建立三省六部以来，主要由工部从事治水政令的管理。明清以来，工部属官改称都水司，成为专设中央水行政机构。

出于对江河安澜的重视程度，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均单独设立派出机构与官员，主管水利工程建设计划、施工、管理等。唐及宋金元时期设都水监，管理江河治理工程。明清时期，江河管理体制进一步发展，创设了专门的河道管理机构——总理河道衙门与河道总督。清代河道总督与主管一省或数省地方政务的总督级别相当。

地方水利管理机构大体分为文职和武职两个系统，与历代地方行政建制有关。地方一般都设有专职或兼职的农田水利官员，重要灌区还设有专门官员负责监督。例如都江堰工程在东汉时设都水掾、都水长，蜀汉时设有堰官，清代则专设水利同知。支渠、斗渠以下或较小的灌区，一般由民间组织自治管理，实行渠事公议、渠长公举等制度。

## (二) 近代水治理任务和体制

### 1. 近代水治理任务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加速



芍陂

解体，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55年黄河改道入渤海，京杭运河在山东被拦腰截断而萎缩成区间运河，1902年废除漕粮征收制度后，京杭运河的漕运使命宣告终结。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境地。这一时期，水治理的主要任务仍是防洪、灌溉和航运等，水利在局部地区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是日渐衰落。

孙中山先生提出整治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珠江五大江河、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引进，并促进了我国水利技术和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坝工、水电、船闸的初步实践。

### 2. 近代水治理体制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将水利分属内务部和农商部，随后设置全国水利局，由三个机构协商办理。1934年统一全国水利行政，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总管全国水利事项，下设水利委员会。政府逐步认识到流域治理的重要性，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河流设立流域管理机构。1947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水利部，并统管黄河水利工程总局、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华北水利工程总局、东北水利工程总局、珠江水利工程总局等流域水政机构。全国共有17个省份设置了水利局。1915年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培养水利人才的学校——南京河海工科专门学校。1931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水利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南京河海工科专门学校 1915 年 3 月 15 日开学典礼

### (三)当代的水治理任务和体制

#### 1.当代水治理任务

新中国成立至 1988 年《水法》颁布,治水的中心任务是治理江河、防治水旱灾害、发展农田水利、水电建设,工作重点是水利工程建设。世纪之交,特别是 1998 年后,治水思路发生深刻变化,水利工作更加注重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保护、水环境污染防治等。



1998 年抗洪救灾

#### 2.当代水治理体制

1988 年前,水利部与电力部等部门几度分分合合。1988 年《水法》颁布,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水利部作为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涉水事务管理。2002 年《水法》修订,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水利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国务

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有关工作。

### 三、悠久的治水历史 积累了丰富的水治理经验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治水实践中积累沉淀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是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治国理政和治水兴水有重要借鉴意义。

#### (一)治国先治水

对农耕文明来说,水利是发展的基本保障、涉及民生的头等大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综观我国历史,无论是分裂割据时期出于增强国力的考虑,还是一统天下时出于安定人心、发展经济的考虑,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将水利作为稳定江山社稷的先置要事,他们或兴水利,或治水害,或通漕运,或以治水之道治理国家。善治国者必治水,善为国者必先治水。

#### (二)乘势利导

《淮南子·原道训》把禹治水方略概括为“禹之决读也,因水以为师”。春秋管仲治水强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秦时李冰治水“乘势利导,因时制宜”。这些思想是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强调充分掌握河流的流势和其他自然条件,加之利用和正确引导,利用有利条件消除不利因素,根据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采取不同的措施把水治好。

#### (三)道法自然

都江堰工程体现了与天地自然相协调、顺应事物运动规律的特征。坎儿井巧妙利用地理条件以雨雪潜流渗入地下,滋润戈壁变绿洲。西汉贾让提出“治河三策”,主旨是不与水争地,给洪水以出路。明代潘季训提出“束水攻沙、放淤固滩”。这些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哲学



思想,对后世治河影响极大。历史经验表明,在处理人与水的关系方面,必须对大自然、对水始终保持足够的敬畏,在利用水的同时不能侵害水,让水能够持续为人类造福。

#### (四)凡水政,详立法之意

法规与制度建设是治水的重要保障,我国用以规范治水行为、用水权益、建设权责的水利法规出现早、体系全。唐代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宋朝《农田水利约束》、金代《河防令》,是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法和防洪法规。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元明清三代都有关于运河管理的法规,如明《漕河禁例》《漕河夫数》《漕河水程》等。古代一些地方法规对水利建设管理、水权、水利投工投劳等都有明文规定。

#### (五)术业有专攻

历朝历代都重视科技在治水中的作用。我国水利科技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为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大禹时期就出现了所谓的“左规矩,右准绳”,是原始测量工具和技术的典范。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再到元明清时期,我国治水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在水文、灌溉、堤防工程、施工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白鹤梁石鱼

#### (六)非专司不能尽其成功

由于治水的特殊地位,历史上一直强调设立专门的水利机构执掌治水。几千年来,管理水利的政府机构、官职设置、权力授予、决策程序和运作机制等,相沿承袭,代代都有发展,深深地渗透到

国家机器之中。我国古代水利职官的设立,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禹作司空”“平水土”,其为“水利设专司之始”。秦汉以来,历代均在中央设置有水行政管理机构。隋唐时期形成了条块结合的水行政与专业管理体系。至明清时期,更具集权特质的河工管理体系建立起来。民国时期演化成水利部,专门负责全国的水利建设管理事项。

#### (七)用事者争言水利

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史记·河渠书》,记述了从禹治水到汉武帝黄河堵口这一历史时期一系列治河防洪、开渠通航和引水灌溉的史实之后,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并指出“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历朝历代希望有所作为的政府和官员,很多都重视兴修水利,竞相为水利建设建言献策。中央政府有专管水利的属官和部门,地方政府设专门官员监督管理水利,民间组织和用水户也积极参与治水活动。

#### (八)治水必躬亲

治水要求心怀天下,献身负责,不怕吃苦。《史记》记载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履园丛话》记载海瑞治水顶风冒雨。治水者必须亲自跋山涉水,踏勘地形水势,因地制宜。“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要求既不拘泥于成规,又不道听途说。



依水而建的民居

(来源: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微信 2018年11月3日)

# 1930 年代长江水灾 与“废田还湖”问题研究

□胡勇军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Events) 是指天气和气候的状态严重偏离其平均态, 在统计意义上属于小概率事件, 即不易发生的事件。尽管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较低, 但往往会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 并且常年受东亚季风的影响, 故而经常发生各类极端气候事件。在南方地区, 人民时常遭受洪水的侵袭, 如 1998 年中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灾使 2.23 亿人受到影响, 经济损失高达 360 亿美元。大水之后, 中央政府特别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 出台并实施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治水方针。

相比而言, 民国之前历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长江均缺少统筹治理, 大都是任其自然变迁, 这主要是因为长江流域的水利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和水运两个方面。无论是灌溉还是航运, 历来都是利多弊少, 尽管也会决堤漫溢, 但其危害远逊于黄河和淮河。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郑肇经曾言: “自大禹施治以来, 四千余年, 江岸虽间有小变, 而大体安流无恙, 绝无黄河改道横绝之事, 故历代治水, 遂重河而忽江。”对于黄河和长江利害的不同情况, 民间社会还将长江嬉称为“中国挣家子”, 而黄河则为“中国败家子”。清末民初,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 长江淤塞严重, 影响了航运交通, 加上西方国家一直觊觎中国长江流域的控制权, 故而“治江之说, 始有与治河导淮并重”。尤其是

1931 年和 1935 年, 长江流域连续发生特大洪灾, “患灾相仍, 举国人士触目惊心, 益知治江之要, 不亚治河”。

正如 1998 年长江洪灾一样, 1931 年的水灾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以及社会人士的高度关注, 并针对水灾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蓄洪、泄洪的低地和天然湖区被大量放垦侵占。对此, 政府当局组织水利专家召开了废田还湖会议, 并颁布了废田还湖执行办法。1935 年长江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灾, 且严重程度超过了 1931 年, 废田还湖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将 1930 年代长江水灾为例, 重点论述极端气候事件发生之后中央和地方对围湖成田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遭遇的困境, 以此揭示在治水过程中需要应对的种种问题。

## 一、围湖成田与长江特大水灾的形成

1931 年 6 月至 8 月, 全国发生特大水灾, 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流域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数月之内, “长江之水未退, 黄河之水又增, 汉口之难未纾, 洛阳之灾又起”。此次水灾波及全国 23 个省, 死亡约 370 余万人, 灾民达 1 亿人。在长江流域, 沿江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无一幸免, 受灾面积 48700 方里, 受灾人口 2290 万人, 直接损失超过 20 亿元。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北省, 全县被淹的有 15 个, 淹去十分之七八的有

13个,淹去十分之五六的有5个,淹去十分之三  
四的有14个,总计被淹田地2752万亩,被灾人口  
956万余人。1935年,长江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  
灾,湖北省沿江各县堤垸大多溃决,仅汉阳至松滋  
一带就多达23处干堤溃决。此次洪灾造成的损失  
比1931年更为严重,仅湖南和湖北两省就有88  
个县市受灾,灾民约1400万人,7300万亩农田受  
淹不能耕种。

根据时人的分析,1930年代长江流域连续发  
生特大水灾的直接原因是降雨量过多,宣泄不畅,  
长江河身难以容纳,水位增高超过堤防。以1935  
年水灾为例,当年6月长江流域各地霪雨兼旬,赣  
江、修水、信江各流域平均雨量竟达752公厘,沿  
途涨汇,至入鄱阳湖处,水高已有一丈有余。7月,  
各地降雨不止,且雨量有所增大,“为数十年来所  
未见”。自汉口至镇江,降雨量均在400公厘以上,  
安庆、南京、镇江一带为降雨中心,降雨量均在  
600公厘以上。此外,洪水期内的台风都集中在7  
月,尤其是7月3日至8日以及21日至25日两  
次为最大。台风经过时,雨量自50公厘至200公  
厘不等。连续降雨之后,各地水位暴涨,湖北水涨  
面积约七百余里,湖南水涨面积约六百余里,安庆  
水涨面积约五百余里。洞庭湖的水位在7月7日  
至9日上升到最高点,湘湖水位于7月9日至11  
日陡然高增,鄱阳湖亦继续猛涨。

在前文中已经提及,历史时期长江水患往往  
要少于黄河和淮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江  
流域有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大型湖泊调解水  
量。在水涨的时候,“江流不能容纳,则储之于两  
湖,迨冬季水退之时,则由湖放水以利航运”。对  
此,民国水利专家朱士俊曾这样论述洞庭湖与长  
江的关系:“自宜昌至城陵矶四百四十公里间,洞  
庭亦为扬子江之叉道,纳自四口而吐于城陵矶。扬  
子江又为洞庭湖之尾闾,汇储湘省诸水系而宣泄  
入江。江与湖有时交相为利,有时亦交相为病。利

在可以暂为积水而调剂洪峰,病在江湖会注处之  
交相拥阻,江流时变,湖底渐淤。”另外,根据数据  
统计,1931年7月,镇江雨量与夏季水位相关系  
数为正0.57,而当月九江雨量与该处水位相关系  
数仅为0.26,其缘故就是有赖于鄱阳湖的调节。

然而作为蓄洪、泄洪的低地和天然湖区被大  
量放垦侵占,导致其蓄水容量骤减,调解长江水量  
的功效亦逐渐衰退。早在19世纪中后期,长江中  
下游地区大片沙洲被开垦,位于长江南岸的湖北  
省公安、石首、华容等县,北岸的监利、沔阳一带,  
以及从湖北的黄梅、广济到安徽的望江、太湖各  
县,已是湖田一片。阻水长堤延绵数百里,江汉上  
游二十多个泻水穴口大多淤塞。大片早期干涸、汛  
期受水,起着泄洪作用的低地,被挡在河堤的后  
面,“而泽国尽化桑麻”。此外,具有调解长江水量  
功效的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等自然湖区也遭受  
不同程度的围垦。

洞庭湖地处长江中游荆江段南岸,西南有湘、  
资、沅、澧四水入湖,北有长江的藕池、松滋、太平  
三口流入,湖水在北部的城陵矶与长江汇合,为一  
典型的过水吞吐型湖泊。自清咸丰二年(1852)藕  
池决口之后,江水倒灌,流入洞庭湖,夺湘、资、沅、  
澧四河出口,回旋东行,并挟带大量沙泥,淤垫湖  
底。“数十年来,日积月累,遂将周围八百里洞庭,  
逐渐淤塞,沙洲栉比,芦柳丛生。向日之天然蓄水  
湖,今已大半变为人烟稠密田园广阔之农村”。此  
外,滨湖各县居民与水争地,围占成湖田,导致洞  
庭湖湖身日益缩小。对此,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厉行  
禁止,反而鼓励围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  
南布政使司引发垦照,招佃放垦。1918年湖南省  
督军张敬尧宣布,对新淤洲土“凡欲领亩开垦的,  
可缴费领照,筑堤围垸”,由此引发农民争相围垦。  
截止到1931年止,环洞庭湖地区已经筑有垸田约  
400万亩。

与洞庭湖一样,清末民国时期,太湖湖区也遭



到滨湖农民以及外来客民的大量围垦，尤其是吴县和吴江之间的东太湖。根据统计，自光绪十七年（1891）至1935年，东至吴江县横扇沈家荡，西至叶家荡，南至南厍三官堂，北至吴县沙泾港东斜路村、木履村，东西宽18里，南北长20余里，圩基底宽3米，面宽1米，均已围筑成，共筑大小圩围150多个，总面积约8.5万亩。这些围垦已经侵越至东太湖的湖心，“太湖水利，已受绝大之影响，更使东太湖完全失却蓄水作用”，由此也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担忧。张潜九说道：“围垦湖田不仅把东太湖占去五分之四以上，甚至于把吴松江、娄江这两条泄水干河都筑断了，这既减少了湖水的容量，又失去了两路宣泄湖水的要道”。对此，吴江士绅赵升元在县政议会上提出：“太湖内多围一亩湖田，即减少一亩田面积蓄水之量，长此以往，沿湖居民，受害不知伊于何底，拟请从严禁止，以维水利而利民生”。

对于围湖成田造成长江水流无处调蓄，进而导致洪水泛滥的事实，政府当局对此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1931年水灾发生之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委员的熊希龄在《十六省水灾救济意见书》中指出：“清代对湖田、沙田均有限制，并分为官围、民围、私围三种，其中有碍于水道者，则由地方官履勘禁止，或者是立即拆除，不准再筑。……民国以来，地方官视为利藪，设局放垦，湖田沙田，日以增加，水道遽蹙，致有此次之大灾。”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秦汾在视察完1935年长江洪灾后写道：“近年来长江屡成水灾，推厥原由，虽甚复杂，而最显明者，实为往时蓄水之湖荡以及滨滩江地与沙洲，多已圩垦成田，与水争地，势必溃决，此常理也”。

除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官之外，社会人士在分析水灾成因的时候也纷纷指出围湖造田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沈怡在分析1931年长江水灾的原因时指出，清末民国时期，各省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纷纷设立沙田局，“不问水道之影响何若，专以发部照卖水地为能事，其工作既与水利机关各部相谋，目的又完全相反”。此次长江水灾的发生，除了因水利失修导致长江干流和支流日渐淤浅外，“诸湖受水之区，其洲渚复被私人纷纷侵占，以致水无所容，横决为灾”。关于1935年长江洪灾，时人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从前长江不闻水患，实由洞庭容量宏大。近以洞庭泥沙淤积，容量日减，当地人民复因其沙滩渐积，增筑堤垸，与水争地，遂至湖面日益狭小，更难容纳长江洪流，其他沿江湖沿此类情形尚多，此为长江泛滥之重大原则。”对此，有人不禁感叹道：“在欧美各大河流，大都建筑有人工储水库，以免水患，而我国长江有天然储水库，不知利用，反垦湖为田，与水争地，使湖之容量日形减少，开垦湖田，增加农产，从表面看来，似乎有利于国计民生，但不知贪图小利，而遣莫大之祸患。”

## 二、废田还湖会议的召开及其执行效果

1931年的水灾充分暴露了长江流域围湖造田的严重危害，民众并将其视为妨碍行洪与蓄洪的症结所在。一时之际，废田还湖之声高涨，成为当时社会聚讼的焦点。甚至在一些地方，因为围田造成水灾问题引发矛盾和纠纷。在南通掘港，自华丰公司筑围垦植南灶低洼地区之后，“凡遇到大水，因围坝阻止，水遂不能东流入海”。该地民众由于惧怕公司之威势，一直以来的敢怒而不敢言。1931年7月，霪雨兼旬，南灶尽成泽国，民众聚集数千人，挖开公司所筑之坝，引发大规模械斗。

为回应社会诉求，行政院于1931年9月22日召开了第40次国务会议，宋子文、王正廷、李书华等人出席。此次会议首先讨论了蒋介石提议的“废田还湖以及导淮先从入海着手以防水患案”。此项议案明确指出，长江水灾的发生“固由本年雨量过多，而旧时蓄水湖面减少亦其要因”。为防患未然，除了由主管机关通盘规划外，治标之计应先

飭令沿江各省政府“详细查明辖境各湖面界至及历被圩田侵削若干，须将此次大水冲破各圩又系近六十年以来所新筑确在旧时湖身以内者，一律废田还湖，恢复原状，而使江流得有相当涵蓄之所。”最后经众人议决，先由内政、实业、交通三部部长召集水利专家以及有关单位会商办法。

10月7日，三部部长就此事进行磋商，并确定会议事项。11月2日上午，废田还湖导淮入海会议在内政部举行。李仪祉、武同举、沈百先等15位水利专家，内政、实业、交通等六部委，苏、湘、鄂等九省的代表，共计50人参会。在下午的审查会上，刘荫弗主席决定分废田还湖和导淮入海两个小组审查提案，并推定沈百先、燕方略、齐群、张自立、孙辅世等14人为废田还湖审查委员。3日上午九时，废湖还田会议举行第一次大会。众人按照审查意见进行讨论，最后议定两项原则：一是阻碍寻常洪水流之沙田、滩地，及侵占寻常洪水所需停蓄量之湖田，一律应废；二是沙田、湖田、滩地，除照第一项所规定应废者外，仍予保留。此外，还制定了具体整理的步骤和方案：（一）由内政、实业、交通三部会呈行政院请通飭关系各机关，对于河湖沙洲滩地暂行停止处分；（二）由内政部通行各省政府及水利主管机关，迅速会同勘定所属河流寻常洪水位、行水区域、泛滥区域，汇报行政院公布；（三）由内政、实业、交通三部会同迅速起草水法，在水法未制定以前，由内政部先行起草防洪法；（四）在二、三两项未办妥前，先由水利主管机关就有显著妨碍之沙田湖田滩地加以取缔，其有关两省以上者应会商办理；（五）此后河湖沙洲滩地，经水利主管机关之研究，认为妨害水流及停蓄者，一律严禁圩垦。

1931年12月，内政部根据废田还湖会议所提出的意见，制定了《废田还湖办法》，并于12月8日行政院召开的第48次国务会议上审核通过。随后，行政院立即通令财政部及各省市府遵照办

理。接到命令之后，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江苏、云南、河北、上海、南京等省市立即发布训令，要求相关部门按照办法第二项，将所属各河流寻常洪水位和行水区域、泛滥区域迅速勘定，或会同水利主管机构勘定，同时取缔影响水利的湖田和沙洲滩地的圩垦。尽管此项命令是要求全国各省市都得执行，而对长江流域来言，湖田分布较多的湖南和江苏省的态度尤为重要。

接到通知之后，湖南省政府虽然也发布指令，要求相关机构执行《废田还湖办法》。但是不久之后，省政府又鉴于本省特殊的湖地情形，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不违背废田还湖原则的情况下，对其中的执行办法稍加变更，“酌留垦田，以利税收”。具体实施办法为，首先派人对湖淤进行勘测，经主管水利机关审定后，在不侵占寻常洪水所需停留量的原则下，对早已形成且又不妨碍水道宣泄的垦田，仍准予正式放垦；对有碍水道的垸田，则勒令刨毁，或酌改堤线。其理由有二：一是湖田数量过巨，茫然行动会引发社会矛盾。境内滨湖区域范围极广，因自然原因而淤高的荒地逐年增加，面积约在一百万亩以上。这些淤地大部分不阻碍洪流，且多数已经被民众耕植，甚至私修堤垸。尽管地方政府严禁圩垦，但民众依然是私垦私修，防不胜防。如果现在全部刨毁，不仅会影响收获，更会引起争夺械斗之风，因而不如因势利导。二是洞庭湖区湖田变化异常。洞庭湖水势随时变迁，数年前以前的水沼即可淤成高地，而以前的高地也常沦为湖荡。近年来，被大水冲塌的垸田多达数十万亩，如能将新淤的湖田酌量放垦，这样一废一兴，并不影响洞庭湖的容水量。相较而言，湖南省水利委员王恢先的态度更为直接，他明确表示，《废田还湖办法》在洞庭湖区难以施行。

查滨湖各县约已修垸田，约四百万亩……占水量者非堤圩，而乃淤洲。致水患者非垸田，而乃沙泥。欲除水患，必自去沙泥始。垸田之存废，关系

于洪水之涨落也，至属轻微。至就洞庭湖形势而论，废田一案，无急切施行之必要也。且滨湖各县，为吾湘富庶之区，每年产谷约二千余万石。除供给本地民食外，尚有余粮以济邻县或邻省之需。人口约四百余万，分居各垸，依垸为生。现既无移民之地，又无移粟之区。遽夺其田而废之，非但不智，抑且难能。此就情理至论，废田主张，有不能实行之困难也。

在此背景之下，湖南省废湖还田的成效自然是令人堪忧。1933年，朱墉在论及当年长江水位时说，尽管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废田还湖办法》，但是“一般人不以利害相权，于水灾委员会所筑干堤之外，又增筑小堤，洞庭、鄱阳之间，圩堤如纲，化沧海为桑田，水无相当之去路，而欲其不肇祸”。

与各省政府一样，废湖还田的通知下达后，江苏省政府遂于1932年1月29日发布第904号指令，飭令相关机构一律停止放垦洪水所需停蓄的沙田、湖田、滩地，同时要求财政厅汇报废田还湖办法的执行情形。在太湖地区，地方政府以及士绅“每以水利问题，阻挠放领，此放领亩数，日渐减少……自清理机关接奉行政院令，对于放领江滩，须先列表送由主管机关审查，确与水利无关者方可放领。经此一层束缚，可放沙地，更为短少”。1934年，江南遭遇大旱，太湖湖水干涸，围田甚易。来自河南、苏北等地的数万灾民逃荒至此，随之客民土著竞相围湖造田。1935年3月，一批客民首先树标筑圩，随后民生、开南、松陵等围田公司也纷至沓来，竞相雇佣客民，肆行大规模围筑，分别在吴县、吴江境内围田2万余亩和3.7万余亩。不久之后，在江苏省政府和县政府的严令之下，吴县和吴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拆围工作。由此可见，《废田还湖办法》的施行确实对太湖湖田以及沙田等官产的放垦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此外，江苏各县在兴利水利工程时，也会兼顾

废田还湖的原则。1934年江苏省建设公布旱灾工赈施工计划，拨水利公债四百万元，办理疏浚江南各县河道，其中第二项就是疏浚赤山湖河流域。为了增加赤山湖的蓄水量，计划将环湖的11个圩区废田还湖，约计8800余亩。[44]在徐州，铜山县政府将疏濬东北两关的黄河故道、引西南汗王乡拔剑泉之水东入石狗湖以及废田还湖三项工程作为视为解决徐埠水利的根本办法。当然在一些地方也存在问题，如江苏和安徽两省交界的灵璧县，因青豕湖湖田问题，时常与邻县发生纠纷，“每届麦秋，皆系萧人越境强割攘夺，致生械斗”。为此，地方政府企图借助实施《废田还湖办法》，永息纠纷。但萧县人凭借武力，“不独割收湖中之麦，且进而攘夺灵境民田”。

由此可见，《废田还湖办法》颁布之后，虽然各省政府均积极响应，但具体到地方，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尤其是在洞庭湖和太湖地区。究其原因，一是洞庭湖区入湖泥沙较多，湖田淤积速度过快，且涉及范围较广，如1936年湖田面积达586万余亩，广泛分布于沿湖十个县。由于常年缺乏管理，积重难返，而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废田还湖的社会成本巨大。另外，地方政府虽然厉禁修垸，并严令废田还湖，“然住民为生计所逼，仍在与水争地，或不筑垸而先行开垦，或私自围修，而不报案，并未因禁令而减少或停止其筑垸行动”。相较而言，太湖入湖泥沙少，且集中分布于吴县和吴江两县，牵涉面还处于可控范围。二是太湖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江浙地区，政府管控制力较强，并且废田还湖政策得到了地方政府、士绅以及民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乡民因切身利益关系，颇为努力，“深明拆围利益，参加踊跃，努力工作所致。”相反，洞庭湖所处的两湖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对其影响力有限，加上废田还湖牵涉民生和地方利益太广，省政府、地方士绅和民众多有抵触，甚至公开认为此项政策在洞庭湖区不可施行。



总体来看,自1931年《废田还湖办法》颁布之后,各省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内政部曾派员赴各地进行实地调查,最后的结果是“各省每多阳奉阴违,对于湖田滩地仍旧处理,致江湖容水之量,日益减少。贪目前之小利,遗来日之大害,应请重申前令,督饬各省市府暨财政部切实奉行。”无怪徐伯符在研究太湖湖田时曾感慨道:“政府必具有绝大之决心,详密之计划,与实行之力量,断非一纸空文所可奏效,故当二十年大水之后,一时雷厉风行,但不久事过境迁,即烟消云散矣”。

### 三、废田还湖办法的重申及其调整

1935年,长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再次发生特大水灾。洪水发生之后,作为财政部长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管水利事务的孔祥熙,极为关注水灾情况。7月7日,孔祥熙特派秘书长秦汾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傅汝霖率同工程人员,分赴长江上游一带查勘沿江各省灾情,以图挽救。7月9日,孔祥熙特电苏、皖、赣、鄂、川、湘等省政府和建设厅,饬令加强防堵,以免发生重大危险。7月15日夜11时,孔祥熙乘坐夜快车入京,出席16日的行政院例会。同日,他又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大会,在会议上听取了秦汾、傅汝霖的视察报告,并与众人商讨长江、黄河防汛方策。根据秦、傅两人的调查,围湖和围江是长江水患的症结所在:“近年屡成水灾,推厥原因,虽甚复杂,而最显明者实为往时蓄水之湖荡以及滨江滩地与沙洲,多已圩垦成田,与水争地,势必溃决,此常理也。”7月29日,全国经济委员会鉴于《废田还湖办法》制定之后,“年来因国家多事,迄未实施”,遂再次重申其重要性,并饬令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机关,“对上项办法如何实施,当有切实研究”。

8月14日,孔祥熙亲自偕同傅汝霖和工程师朱士俊等人,赴长江和黄河视察灾区情况。返京之

后,孔祥熙召集濬浦局长宋子良、傅汝霖、秦汾以及华洋工程人员等,连日悉心研讨,拟定标本兼治办法,“以冀防北水患,兼收水利使利运输之效”。在此期间,傅汝霖发表治理扬子江防洪初步计划,其中一项就是整理蓄水湖泊。他指出,洞庭湖、鄱阳湖以及其他湖泊,“不宜再加围垦,以缩小其容量,其旧有之各项埂坝圩围等,应速测量,厘定去留标准。凡有碍排洪及侵占洪水以下之围垦堤埂,均宜取缔,以增大其蓄水效用,兼利于排洪速率之增加。”9月3日,行政院召开第228次会议,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出席。在会议中,孔祥熙提交了江河水患标本兼治办法案,并经决议通过,报告中央政治会议。

江河水患标本兼治办法主要分为治本和治标两策,其中治本之策有三:一是疏导长江;二是废田还湖与废田还江;三是治理黄河。其中废田还湖与废田还江一项指出,“长江自宜昌至城陵矶,长约二百三四十海里,之中淤积沙滩至五十余处之多。从前长江不闻水患,实由洞庭容量宏大,近以洞庭泥沙淤积,容量日减,当地人民复因其沙滩渐积,增筑堤垸争地,遂致湖面日益狭小,其他沿沼,类此情形尚多,此为长江汛滥之重大原因”。关于经费筹集的办法,可通过加征濬江附加关税、交通附捐、沿江两岸田亩捐。此外,孔祥熙已经意识到过去国家对于自然灾害,只注重赈灾,而忽视防灾,当前政府“根本治导,预防灾难之再至”。会议结束后,财政部开始着手研究关于疏濬治导、废田还湖与废田还江的经费筹集实施办法。

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在参加完会议之后当即赶回武汉,传达了中央对水利高度重视的精神,以及行政院会议通过的“以疏濬治导废田还湖治本、复工堵口治标”的办法。此外,他明确表示“鄂省赈务,决以急农赈治标,而以工赈治本。鄂境溃堤极多,又有官、民堤之分,将来修复后,统筹治本,可免官民之争,予人民以心理上之安慰”。11月,湖

北省政府制定了改进水政计划,鉴于“支堤民堤尤多,与水争地,近代湖面日小,江流日狭,大都由于人民筑堤围淤所致”,其中一项改进办法就是建立整理和管理民堤的制度。然而就在一个月之后,12月4日,湖南和湖北两省士绅熊希龄、覃振、程潜、赵恒惕、章士钊等人电呈南京国民政府,申述废田还湖的困难,希望由此改为多开湖渠蓄水,并恳请中央委派水利技术对洞庭湖进行查勘,以此制定清理计划。

由此可见,在经历1931年和1935年水灾后,国家从决策层面数度强调废田还湖原则及其执行办法,然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废湖还田涉及多方利益,错综复杂,施行难度颇大,不如切实具体的防洪措施易于操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废田还湖办法不仅是面临执行难的问题,而是已经不能适用。因为执行办法所规定的责任主体如内政、实业等部门执行的事项,已按照统一水利行政要求,移交全国经济委员会接管。经此变更,此项办法实际上就几乎被废止了。

在此背景之下,时任江苏省府主席陈果夫指出,“几于每年必灾,每灾必巨,民生与国家元气两受影响”。《废田还湖办法》至今未能切实施行,原因固然很多,关键是防洪与民生出路没有兼顾。为此,他在1936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提交了“整理江湖堤间土地,消除水患,从事有计划之农业生产案”。此案建议首先划定湖界,然后在界堤外进行有组织开垦,“以生产所余为水利建设及救灾之费,再加以移民垦荒”。如此,不仅能够消除水患,水利经费、移民安置等问题均能得到解决。最后,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先交经济、土地两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再由行政院签发内政、财政、实业、交通各部及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等相关单位审议。

1936年9月2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决通过《整理江湖沿岸农田水利办法大

纲》,并交行政院执行。9月16日,内政部召集实业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各主管机构商拟执行办法。12月8日,办法大纲和执行办法经行政院第291次会议决议通过,并由行政院一并公布,通飭施行。大纲第一条规定,江河各巨川及各湖泊,应依照10年一遇的“寻常洪水位”勘定蓄滞洪区的范围,划定界限。第二条即沿界修堤,堤内准人民种植,堤外之地为蓄洪区,一律禁止私人耕种,如已放垦,则由政府发行地价券,收归国有。第三条即移民安置,堤外人民一部分人可由政府编为农田水利集团之组织,在农时耕种政府所指定堤外之地,闲时则从事于政府指定之水利工程;其编余之一部分,可持地价券向政府所指定就近适宜之地区购领荒山荒地,从事开垦。第五条即开辟国营蓄洪垦区,在非蓄洪期进行垦殖,以自筹水利经费;蓄洪期若有妨碍,则退田还湖。由上所见,此项办法统筹兼顾水利、民生与经费,相对于过去偏重废田还湖以达到防洪的目的,而不谋求补救办法,无疑是一种进步。

1937年,江苏省政府根据办法大纲拟定《江苏省整理江湖沿岸农田水利实施细则》,并于3月2日的省府委员会第891次会议通过。此项细则首先明确说明此次整理的区域分为江南和江北,江南主要包括扬子江、赤山湖、石臼湖、固城湖、长荡湖、溇湖、太湖及其下游各湖泊。其次,规定已经测量的江湖要竖立界桩,未测量的江湖要测定界,在界桩内的民有围田、基荡要收回。最后,要求调查收废区域内农民的户口、地籍以及生活情况,并以此组织农田水利集团或另定移垦办法。3月30日,行政院第306次会议召开,审查通过了此项实施细则。随后,就在东太湖地区开展划界禁垦和疏浚两大标本兼治计划,废田还湖由此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1937年4月1日,东太湖界樁工程队正式成立,并在吴县横泾开始动工,整个工程分为七项,

测放桩位、验收界桩材料、试桩、监督浇制界桩、调查石地点击石碑式样、运桩及打桩、补放样桩。根据计划,在沿湖界线,按每3公里埋竖6米长的水泥界桩1根,共计244根;另外,还在松陵、八坼、越溪、南库等沿湖明显位置竖立“东太湖界线图”石碑。11月底,洞庭东山至横泾湖岸外、吴江鲇鱼口一带的水泥界桩陆续完成。界桩竖立结束后,遂按照农田水利办法大纲制定蓄洪垦殖工程计划,并将东太湖辟为国营蓄洪垦殖区,每年直接生产约达400万元,纯利约为76万元。

在湖南省,1937年9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根据《整理江湖沿岸农田水利办法大纲》,派查勘队会同湖南省府代表对洞庭湖进行划界。当时省政府表示,已经垦种多年的湖田可以实行放领,“但凡现存之湖则永以为湖,不以为田”。次年4月,勘界工程完竣,共计勘定湖界线1685公里,其中天然湖界875公里,湖堤界线810公里,拟设界标点314个。湖界的划定,并没有阻止湖区民众的围垦,加上抗战暴发之后,地方政府缺乏对湖区的管理,私围现象不断发生。据1946年湖南省滨湖洲土视察团的调查,原定湖界“全失效用”,界堤外的湖床大多淤高,或已挽修成垸,其中盗挽堤垸有55个,面积多达49.3万亩。

#### 四、结语

民国时期,随着人类的不当行为以及自然环

境的恶化,一向不受国人所重视的长江水患问题频频暴发,并越来越严重。1931年和1935年,长江流域连续两次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全国震惊,引发政府当局和社会人士的高度关注。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造成1930年代长江发生特大水灾的因素很多,气候方面的诱因自然难以规避。在此背景下,沿江民众的围湖成田行为成为当时社会议论的焦点。作为蓄洪、泄洪的低地和天然湖区被大量放垦侵占,导致其蓄水容量骤减,调解长江水量的功效亦逐渐衰退。为此,南京国民政府特意召集各省政要、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水利技术专家等数十人商讨此项问题,专门制定了《废田还湖办法》,并数度从决策层面重申其重要性,但执行效果并不乐观。究其原因,既有地方官员执行不力、既得利益者(包括政府官员、地方豪强、沿湖居民等)的阻碍,还有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笔者有专文论述。民国时期治理长江水患的失败启示我们,全国性水利政策的制定必须高屋建瓴、统筹规划,不仅要考虑各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更要兼顾地方民生的需要。此外,政策的执行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配合和支持,而这背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为保障。

(作者: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 讲师)



湖光 吕周亮/摄



# 从水则碑谈古代的水文测量

□涂师平

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处古代测量水位的“平”字水则碑,属于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这块水则碑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古时是平桥河所在地。该碑始建于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8),明清两代续修,现存大部分石亭建筑为清道光时所建,但保留了南宋的亭基和明代重修的“平”字碑。1999年,考古发掘重现了水则碑旧貌,经重修后,当地政府恢复了平桥河,并与宁波城市中心的月湖水系相通,还原了历史原貌。



宁波平字水则碑

这块水则碑取适中之地测量水势,镌“平”字于石碑上。在当时,宁波城外各个楔闸视“平”字于水中出没情况而启闭:如果水浸没了“平”字,则应当泄水;如果“平”字出于水面,则应当蓄水。因水闸启闭适宜,当地百姓无旱涝之忧。在今天看来,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民情,统一调度水务的目的,是今天的人们研究古代水利水文测量、城市排涝防洪水利工程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

## 什么是水则?水则是怎么来的呢?

### 我国最早的水则

水则,又叫水志,是中国古代的水尺,也就是古代观测水位的标记。“水则”中的“则”,意思是“准则”,通常每市尺为一则,又称为一划。刻有水则标尺的碑就是水则碑。水则碑通常被立于渠道的关键地段,它的作用就是观测水位变化,并用来测量水位,以达到预防洪涝灾害的目的,同时作为灌区农业灌溉配水的依据。



据史料分析,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尚书·禹贡》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其意为:禹测量土地,划分疆界,命名山川,带领众人行走于高山,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

我国最早的水则出现在秦昭襄王时(公元前251)。当时,李冰修都江堰,用3个立于水中的石人观测水位,以水淹至石人身体某部位作为衡量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的标记。李冰要求“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意思是水位不能低于石人的足部,也不能高于石人的肩部。如果水位低了,岷江来水

量不够用,会出现旱灾;水位也不能高于石人的肩部,否则会出现洪灾,需要从飞沙堰溢洪。只有当水位在石人的足与肩之间,引水量才正好满足农业灌溉与防洪安全的要求。



都江堰用来观测水位的石人

宋代,都江堰的量水标记由石人演变为刻画水则。根据《宋史·河渠志》的记载,宋代把都江堰的水则刻在离堆的岩壁上,共 10 则,两则之间相距一尺。水位达到 6 则就能满足灌溉需要;超过 6 则,内江水量开始从飞沙堰和人字堰溢洪道排到外江。

元代将都江堰水则刻在斗犀台下的三道岩石壁上,共 11 则。据《元史·河渠志》记载:“牛犀台有水则,尺之为划,压十有一,水及其九则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明代万历年间,都江堰的水则被迁移到宝瓶口,并由 11 则增至 20 则。清代乾隆乙酉年(1765),用条石重新刻划水则,共 24 则,沿用至今。

### 水则的形式

北宋时,江河湖泊已普遍设立水则,主要河道上已有记录每日水位的水历。明清时,为了报汛、防洪,江河上下游往往都设有水则。当时的水则有三种形式:

其一为无刻画形式,如前文提到的石人水则和南宋在今宁波设立的平字水则都是这种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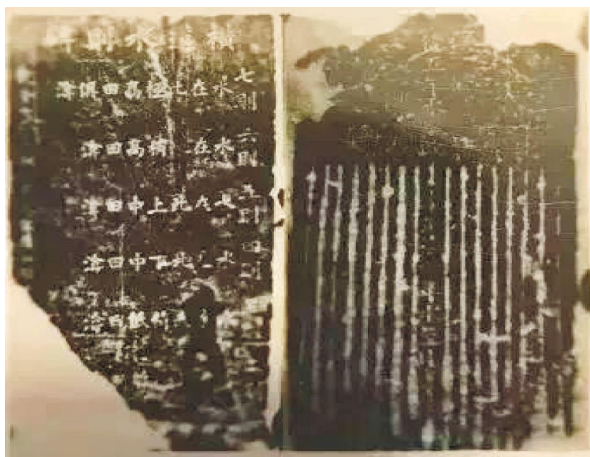
又如绍兴三江闸是我国古代大型挡潮排水闸,三江闸的启闭依据水则。水则有两个,一个设在闸址,另一个设在绍兴城里,后者有校核水位的作用。水则分金、木、水、火、土五划:水至金字脚,全闸开启;水至木字脚,开 16 孔;至水字脚开 8 孔;至火字头,全闸关闭。闸门由三江巡检代管,“启闭惟看水则牌”。

其二为只有洪枯水位形式的水则。如《水经·伊水注》记载,三国魏黄初四年(223),伊阙石壁上的刻画及题词;还有自唐代就有的长江涪陵石鱼只刻记枯水位等。民间自刻的这类水则不少,大江河上往往存有前代遗迹。



白鹤梁石鱼

其三为等距刻画的水则碑。这种水则碑最为常见。如宋代至明代太湖出口、吴江长桥刻有横道的石碑,用以量测水位,此碑还刻有非常洪水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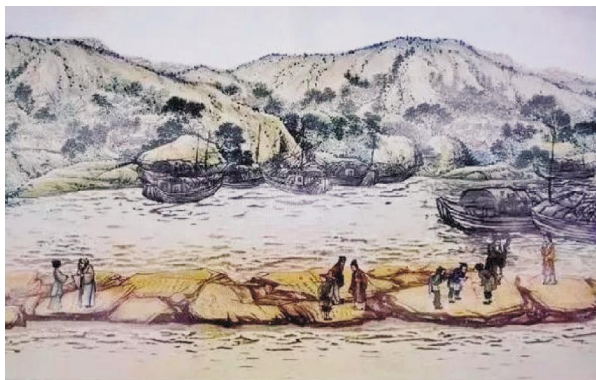
吴江长桥水则碑



吴江长桥另一块刻有直道的石碑为记录每旬水位用,它上面也刻记非常洪水位,1964年被发现时仍立于长桥垂虹亭旧址北侧岸头踏步右端,在碑面刻有“七至十二月”这6个月份,每月又分3旬的细线,还有“正德五年水至此”“万历卅六年五月水至此”等题刻字迹。

### 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历代各朝日益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当时的观测方法较多采用在江岸、河中的岩石上题刻标记,用以记载多年一遇的洪水或枯水水位。始于唐代的白鹤梁题刻就是一种典型的题刻标记观测江河水位的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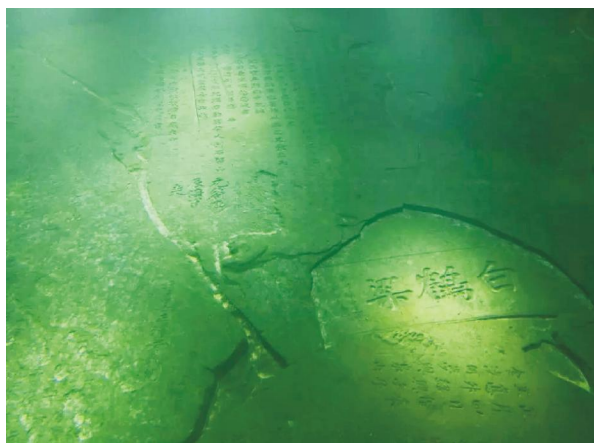
白鹤梁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重庆涪陵城北的长江中,为一道天然的石梁,是世界上已知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水文题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它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白鹤梁是造山运动时自然形成的,长约1600米,宽约10~15米,东西向延伸,与长江平行。其背脊标高约为138米,仅比当地常年最低水位高出两三尺,石梁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白鹤梁梁体分为上、中、下三段,题刻位于中段长约220米、宽约15米的梁体上,迄今发现题刻约165段、文字3万余字,有作为水标的石鱼18尾、观音2尊、白鹤1只,其中涉及有水文价值的题刻108段,是全世界唯一一处以刻石鱼为“水标”并观测记录水文的古代水文站。

白鹤梁题刻始于唐广德元年(763)前,终于1963年,这些石鱼水标及题刻,记载了我国长江上游从唐代至今1200多年来,72个枯水年份的水文情况,系统反映了长江上游枯水年代水位演化情况,为研究长江水文及全球区域气候变化的历史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据有关部门观测,白鹤梁唐代石鱼的腹高,大体相当于涪陵地区的现代水文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所刻石鱼的鱼眼高度,又大体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所设的当地水位的零点,为可满足轮船航行的最小水深的水位线。



另据观测，白鹤梁题刻中有一尾标注最早的枯水题刻的石鱼，它的眼睛正好是长江中上游的零点水位，比 1865 年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武汉江汉关水尺的水位观测记录，要早 1100 多年。当地有“石鱼出水兆丰年”之说。据称如果石鱼在冬天枯水期露出水面，则第二年必是丰收年。葛洲坝和三峡水利工程建设都曾经以此为依据。白鹤梁也当之无愧地成为“长江古代水文站”和“世界水文资料的宝库”。

除了白鹤梁，题刻长江枯水水位的题记还有很多。这种记载枯水水位的题刻群，仅在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段就有 11 段，题刻 362 处；记录方式包括文字注记和石鱼题刻；尤以江津莲花石、重庆丰年碑、云阳龙脊石、奉节记水碑等最重要。



洪水题刻

除了枯水题刻，我国古代还有不少洪水题刻。

据我国水文考古工作者调查，唐宋以来形成的分布在长江干、支流的洪水题刻有近 1000 处，以明清时期居多。长江上游忠县两处题记，被鉴定为现存最早的洪水题记，其一为：“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十七日，水此。”当时，对于同一次洪水，往往有多处题刻标明其水位，如 1788 年的一次大洪水，仅上游就有 19 处题刻，说明当时对洪水水位的观测已相当普遍。

由于我国河流众多，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

和汛情通报工作。因为河流泛滥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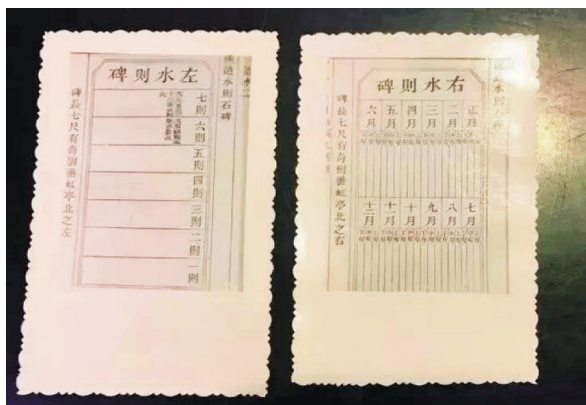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治水工具

除了前面所介绍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碑文题刻，如《黄河图说》碑、《海潮论》碑和苏州立水则碑等。

宋宣和二年（1120），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县长桥垂虹亭旁立有水则碑。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两块，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之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碑文为：“一则，水在此高低田俱无恙；二则，水在此极低田淹；三则，水在此稍低田淹；四则，水在此下中田淹；五则，水在此上中田淹；六则，水在此稍高田淹；七则，水在此极高田俱淹。”如果某年洪水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代为 1194 年。由此可知，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我们不难发现，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明成化年间，戴琥出任绍兴知府，守越十年。为加强绍兴河湖水位管理，戴琥在佑圣观前河中设立水则（即水位尺），又在佑圣观内立水则碑，即《山会水则碑》，并做出规定：“水在中则上，各闸俱开；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拖、龛山闸，至下则上五寸，各闸俱闭。”水则碑对宁绍地区山会平原的河湖水位，对不同季节、不同高程的农田



耕作及舟楫交通都能照顾到,而且设于府城之内、府衙之旁,便于观察和执行。它从成化十二年(1476)起,使用了60年,一直到三江闸的建成才退役。

清代,为了黄河、淮河、永定河防汛需要,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先后在洪泽湖高堰村(1706)、黄河青铜峡(1709)、淮河正阳关三官庙(1736)、永定河卢沟桥(1819),分别设立水志桩,观测水位。

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等列强先后侵入上海。外国侵略者为了保证航行安全,除在黄浦江东岸一侧设置引导灯桩外,又于1860年在张华浜设立“吴淞信号站”,竖起了水尺和信号杆,悬挂水位标球。这是在长江水系最早设置观测水位(潮位)的近代水尺。

清末,帝国主义霸占海关和沿江沿海的航行权,为航运安全,设立了一些海关水尺。此外,原中东铁路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哈尔滨开始观测水位。这些都是用近代方法进行水位观测的最早一批水位站,其中长江汉口站是全国最早具有连续系统资料的近代水位站。

(作者:中国水利博物馆宣传教育处处长 副研究馆员 来源:水利部研究发展中心微信 2018年10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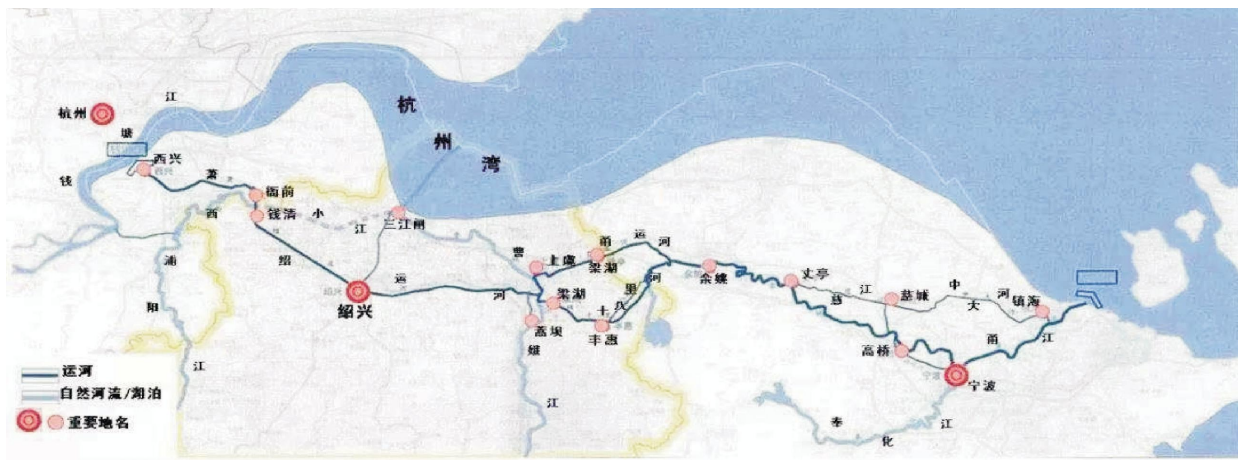
长江汉口水位站



# 浙东古运河源头杭州西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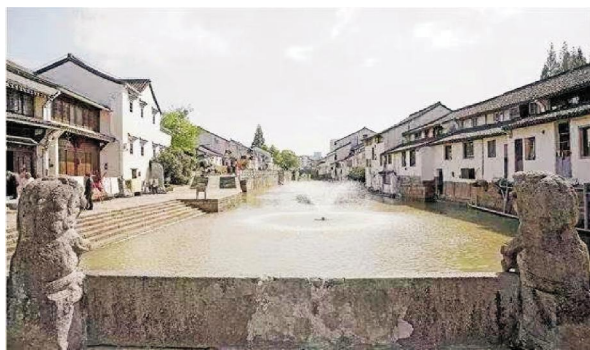
——粉墙黛瓦唐诗韵 千年古镇续繁华

□黄 佳



浙东运河又名官河、漕渠，西起钱塘江南岸的西兴，经绍兴，跨曹娥江，东至宁波三江口，经甬江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

粉墙黛瓦的古朴民宅沿河而建，数百年前的古老石桥跨越两岸，两岸间，一条悠悠流淌的河流穿行而过，水波盈盈，人影绰绰……这里，便是浙东运河古老的起端——西兴（古称固陵、西陵）。



据《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西兴在春秋战

国时代是越王勾践的屯兵重地。吴越交战，这里曾发生过惨烈的战争。后来勾践战败，他带着宠臣文种、范蠡入吴称臣，越国的百姓官吏从首都会稽（即今天的绍兴）一直哭送到西兴拜别，在这里演出过一场撕心裂肺的亡国蒙耻的历史悲剧。到了晋代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了从会稽到西兴这段运河。而整条浙东运河，则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陆陆续续开凿而成的。

这是一条辉煌逾千年而今显得有点恬静的河。浙东运河又名官河、漕渠，西起钱塘江南岸的西兴，经绍兴，跨曹娥江，东至宁波三江口，经甬江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走进古镇便可见从古镇穿行而过的官河，它是历史上浙东运河的源头，河边的水上人家，民风古朴。官河里，水生植物生机勃勃，两岸驳坎，展现出古色古香的河道韵味。





官河从西兴古镇穿行而过

“西兴自古繁华”，历史上，富庶的宁绍平原上的稻米、食盐和其他各种物产，都是通过这条运河，在西兴渡口进入钱塘江径直运往京都。来自日本、高丽、中东和东南亚诸国的使臣、商贾和货物，从宁波上岸，改乘内河船只，也是从这里入钱塘江去晋谒大宋皇帝的。

苏东坡曾有诗云：“江上秋风晚来急，为传钟鼓到西兴。”苏东坡所处的时代还没有现代化的导航设施和灯光航标。当年船只在茫茫杭州湾上航行，就是靠着架设在西兴铁岭关上的晨钟暮鼓来导航停泊的。

除了西兴的繁华盛景，还有一种特殊的行当——过塘行。

一座过塘行，半部西兴史。西兴“通南北之商，

候往来之使”。旧时坊肆栉比，商贾云集，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单是过塘行就有 72 间半，茶店 32 家。当时，由大运河或钱塘江过来的货物，如要转运到浙东各地，就要跨江到对岸的西兴，然后，经内陆河道转往绍兴、宁波一带。由此，便造成了当地过塘行业的兴旺发达。

过塘行，即转运栈，专替过往客商转运商品（货物），一面算盘、一本账簿、一杆大秤就可开张，这一特殊的行当不仅是古代的物流中心，也是人流中心和文化中心。过塘行的兴盛还带动了其他生意的红火。官河两边当年有汤宝楼茶店、延春堂药店、润大昌南货店、祥茂肉店、杨永和布店，还有酒作坊、酱园店等，休闲娱乐，一应俱全。

如今，特色鲜明的“过塘行及码头”文化，也成为了杭州申遗预备名单中首批 7 个“遗珠”之一。

这里一度繁盛的除了贸易还有诗。西兴，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入口。据记载，唐代有 400 余位诗人由杭入越，东游名山大川前，都先登陆西兴（或另一古渡渔浦），观潮仿古后，再乘舟东行。他们登固陵，游妆亭，住驿站，观海潮，睹物生情，缅怀先人，留下瑰丽诗篇无数：李白三人越中，离不开运河舟楫，他的抒情诗《送友人寻越中山水》，将登临西兴后的第一印象告诉朋



西兴过塘行

友,分享快乐;孟浩然的观潮诗《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吟咏雷霆万钧的钱塘江大潮和西兴万人空巷的观潮场面。

数百年间,由于钱塘江江道逐年北移,南岸淤沙壅塞,西兴距江日益遥远,再加上汽车、火车和轮渡的开通,小镇渐渐安静了下来。今天,静静的官河上,镌刻着“福泽长流”的古老石桥上,两只石狮子张着大口,似乎在向路人讲述着,当年西兴确曾是个客商熙来攘往、香火鼎盛如炽的繁华去处;那排满了毛茸茸青苔的石砌埠头,当年是货物堆积如山的热闹码头;这半截掩埋在土里唯留下闸墩和闸槽的永兴闸,当年就是名播东南的古渡放船入江的船闸所在,就在它的脚下,曾日夜不停地奔涌着钱塘江的惊涛骇浪。



学生们在官河边认真写生

铅华尽洗,再续繁华。拆违建、修复老房子、整河道,近年来,借助城市升级改造,沉寂多年的西兴有了新模样。

走过清康熙年间重建的屋子桥便来到了全长960米的西兴老街。2002年,老街列入杭州十大历史保护街区之一,也是目前杭州城区保存最完整的一条老街。踱步于老街的青石板上,古色古香的慢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仍保存着大量清末民初的建筑,清一色的粉墙黛瓦,老式的剃头铺、木凳铺、茶馆和有着千年历史的西兴灯笼,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声声吆喝。西兴过塘行码头专题陈列馆内,来自居民捐赠的老物件向人们展示着运河漕运文化和古镇的迷人魅力。

西兴,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镇,正在杭州高新区(滨江)“构筑天堂硅谷、建设科技新城”的征程中展示着独特的魅力。成群结队的学生们背着画架来到这里,用色彩堆积心中的江南水乡梦,记录着小镇的慢生活;那深巷中静静读报的老人,那在河边摆满花盆的运河人家,望着幽深的古街,他们还在心中构画着一幕幕更美妙的景象:一场古色古香的旗袍秀,婀娜的女子一字排开;打伞的少女在雨巷中渐渐走远,倩影袅袅……

(来源:运河网 2018年11月2日)

# 寻找消失的文明

## ——良渚外围水利系统发现记

□王宁远

### 一、从“土垣”到“塘山”： 塘山长堤的发现与认识

水利系统的发现和研究首先是从塘山遗址开始的。

1981年吴家埠遗址发掘之后，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遗址现场建立了工作站。吴家埠位于瓶窑镇西侧，处在大遮山南麓延伸的一个孤丘西坡。一条土路向北翻过孤丘，下经一片池塘低地，复沿山上行五、六百米，有个湖北坞水库。1987年夏天，路过此地的王明达注意到孤丘北侧连续的池塘南部，有一东西向的长垄。从断面观察，应属人工营建。登上长垄眺望，见其东西绵延甚长，形态规范。这连陶片都不见的一丘土垄此后没有获得更多的关注，因其整体结构、时代无法判断，遂以描述性的名称“土垣”来命名。

这是塘山留在考古人眼中的第一个印象。

1986年由王明达首次提出的“良渚遗址群”概念，渐成学界共识，标志着良渚考古研究的视角，由各自独立的“遗址点”向整体性的“遗址群”转化。在此种思路下划定了良渚遗址33.4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并在1995年公布。尽管土垣的性状不明，考古工作者还是很敏锐地将其整体划入到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遗址群本质上就是把包涵50多个遗址点的区域，当成一个遗址看待，这

种极具前瞻性的大遗址理念，对日后良渚遗址的整体保护影响深远。

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后，为深入了解遗址分布，确立重点保护地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开了新一轮的考古工作。此前1995年罗村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时期的碎陶片，因此遗址的年代判断就成为工作目标之一。

1996年12月—1997年1月，由王明达领队，在土垣的金村和西中村毛儿弄两个地点作了三次试掘。其中毛儿弄先由丁品在村道断面东侧的土垣南坡进行试掘，发现它由人工逐层堆筑而成，但未见包含物。其后赵晔接手在道路西侧的土垣北坡进行试掘，发现底部有块石铺底的现象。与此同时，方向明在金村的试掘则有重大收获。金村段所在的東西向土垣，也有叫“塘山前”的，其南部，当地称“羊后棋”。12月17日，先在土墩南部的水稻田布2×5米南北向探沟T1，其第2层为良渚文化层，陶片碎，与生土的结构、色泽基本一致。

据方向明日记：“12月20日，T1结束，为了与土墩地层衔接对照，决定先清理土墩南部断面，那里灌木丛生，我亲自动用山锄，在高出水田约70厘米发现异样石块，可惜被我挖破了一点点，在水田里清洗后大喜过望，原来真是玉料！连忙拍摄场景。收工时天色已晚，费国平和我一起回吴家埠工作站，一进门我就向王老师报告意外消息，王老师



也甚喜,当晚,大酒。”其狂喜之情,跃然纸上。随后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玉器残件、玉料残块和石质工具,并清理出局部的红烧土面和埋设陶器的灰坑。在试掘过程中,对土垣沿线和周边环境进行了调查,根据当地村民对此地的称呼,正式改“土垣”的称谓为“塘山”。



塘山与良渚古城关系(美国 corona 卫片,1969)

此次试掘不但解决了东段土垣的年代问题,还意外获得了良渚玉器加工的重要线索。在年代问题解决之后,土垣的功能自然会成为考量的问题。考古学者开始在良渚遗址群的整体框架中对其进行了功能推测。王明达一度在器物标签上将地点标注为“良渚遗址群‘城’(塘山罗村段)”,而蒋卫东则撰文认为塘山可能是遗址群外围的城墙遗迹。

2002年4-7月,再次对塘山金村段进行的发掘,获得了460余件玉石制品,发现了与制玉有关的石砌遗迹3处,确认金村段的营建是一个连续堆土加高的过程,并在南部斜坡处用大量块石筑成护坡。在此次发掘中,对塘山遗址的性质功能有了比较明晰的判断。《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0日第一版发表了王明达、方向明、徐新民、方中华联合署名的《良渚塘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制玉作坊》一文,认为塘山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这一观点得到了多位学

者的认同,费国平、张炳火等先后撰文提出类似观点。鉴于塘山多处地段发现了墓葬、灰坑、夯土、积石等遗迹,赵晔认为“塘山的文化内涵具有多重功能”。但是塘山遗址如果作为防洪堤,有一点疑问一直无法解决,即其西部连接到毛元岭山体之后,往南为一条彭北渠截断,再往南就没有山体或坝体,水流从坝内流向了东苕溪,似乎起不到截流防洪的作用。因此对塘山的研究,一直也没有更大的进展。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为了解古城的外围结构,于2008-2009年上半年对塘山遗址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查,并由笔者负责,芦西燕、张晓平等在秀才弄(河中村)双层坝体中间的渠道内进行了首次试掘,布设南北向探沟一条,北部连接北坝坡脚,意图了解渠道的结构和用途,结果探沟内没有发现任何人工遗物,只是发现渠道底部地层夹杂大量卵石等,无法判断是人工还是自然形成,没能实现预期目标。此后一段时间,塘山遗址断续进行过局部调查,系统的工作并未更多展开。

## 二、从“大墓”到“大坝”： 高坝系统的发现与认识

如果说塘山的发现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话,高坝系统的认识过程则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2009年9月中旬,有群众举报在遗址群西北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盗墓”,现场暴露大量青膏泥。文物部门接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余杭区文广新局林金木、良渚遗址管理所费国平等会同公安部门进行现场踏勘。

岗公岭地属瓶窑镇彭公村,位于良渚古城西北约8公里的山间,宣杭铁路和新104国道在此处转了个近九十度的大弯,沿东北向山谷上行通往德清。这个山谷南端最窄的位置有个为一西北-东南走向的“小山”,正好处于铁路转角和公

路转角之间的位置,原来表面长满植被,和两侧的自然山体不能区分。后因施工建竹器市场,小山的上部大部已经被推平,仅东南存一断坎,高达7米多。可见其表面覆盖一层2-3米厚的黄土为外壳,内部全是青淤泥,结构类似豆沙包,可知“小山”实是人工堆土而成的遗迹,与两旁自然山体的石质构造判然有别。其西端被宣杭铁路破坏,东部被新104国道西侧旧岔道叠压,岔道东面暴露山体基岩,可见破坏很小。东西向残长约90米,南北宽约80米,体量巨大。从迹象判断,其性质并非墓葬。刘斌联想到2000年据此几公里处发掘的“彭公战国水坝”,推测两者功能类似。当时整个施工现场都没有发现陶片等遗物,应该是挖掘淤泥和山体的生土堆筑,年代无法判断。根据岗公岭坝的走向和位置特征,向其东西两侧山谷寻找其他水坝。至年底,又发现了附近有5处坝体,根据所在位置周边的山体,分别命名为老虎岭坝、周家畈坝、秋湖坝、石坞坝和蜜蜂垄坝。这些坝体皆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构成水坝群。

关于坝体的断代,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岗公岭断面上偶然发现一块很碎的良渚时期的夹砂陶片。从考古地层学的角度,表明这条水坝的营建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这块陶片所处的良渚时期。其顶部又被东汉墓葬打破,所以水坝的年代就是良渚到东汉之间的某一个时点。这虽然不足以证实水坝就属于良渚时期,但是根据土质土色等一些细节,考古人已经隐隐地产生了一种直觉,但是需要证据。凑巧的是,今年冬天多雨,因雨水冲刷,岗公岭坝的地面和断坎暴露出大片保存很好的草茎。2010年1月18日,我和刘斌等到岗公岭现场,发现这些草保存相当之好,现场可以用手把每块草包泥掰开。刚暴露草的呈黄褐色夹杂一些蓝色,很快氧化成黑褐色。可以分出一根一根的草茎。仔细观察发现,每一包的草茎都是顺向分布的,并没有相互经纬交叠,说明这不是编织过

的草袋,而是用成束的散草包裹淤泥。这些草后来经过鉴定是南荻之类沼泽上常见的植物。南荻,状若小芦苇,也就是苕溪名称里的这个“苕”。有了这些草,就可以进行碳14测年。当时采集了3个样本送到北京大学进行年代测定。3个数据树轮校正后都在5000年左右,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尽管只有这一个坝的年代数据,根据形态和系统分布特征,其他坝体也有极大可能属于同一时期。我们决定立刻加大力度再次调查,以探明整体布局,并进行功能研究。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高坝的6条坝体可以分为东西两组,其中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构成东部一组,坝高约30米,共同控制了一个山谷的来水;其西侧为奇鹤村的谷地,没有发现水坝;再往西的秋坞、石坞和蜜蜂垄又构成另一组水坝。



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坝体现状(北向南拍摄)

2000年时曾经被当做“彭公战国大墓”发掘的蜜蜂垄坝顶上发现有商周硬纹陶,坝体堆土内发现过零星几片良渚陶片,底部是生土地面。从地层学上讲,它的相对年代只能卡到良渚到商周这么个很长的时间范围内,无法更精确到某个时点。坝体堆土内还发现一把完整的木甬,但这类遗物在当时各良渚文化遗址中从未发现过,所以无法以器形断代。但木器是有机质,可以做碳14测年,可是偏偏我国历史时期考古中,根据器物演变规律做出的年代推定可以非常精确,而碳14断代的精度较低,所以很少采用。尽管在发掘结束时考虑过要进行测年,但实际并未实施。一直以来,也从



未有人对其春秋战国的年代判断有过怀疑。据说当时发掘者已经发现周边有若干类似坝体，还去过周家畈现场。今天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做了碳14测年，则良渚高坝的发现或许能提前十几年。错失这个机遇，才是那次发掘最大的遗憾。

水坝发现后，我们对其性质和作用开展了多学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王辉等参与了调查，并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对该系统进行了分析。原先我们推测水坝的作用可能是雨季阻挡了北侧山谷的洪水，将其导向山北侧的德清，防止对下游的良渚古城造成威胁。刘建国通过RS(遥感)和GIS分析，认为坝体会在山谷间形成一个山塘水库，而不可能分洪到北侧的德清地区。还通过集水面和降雨量的分析，推测高坝可以抵挡890毫米的短期降水，达到百年一遇的水平。

这组坝体的发现，让我们对良渚人的营建水平大感意外。

### 三、上帝之眼：低坝系统的发现

塘山由考古学者主动调查发现，高坝系统因群众提供线索而确认，尽管诱因不同，但都是通过传统的考古调查勘探方法，用洛阳铲找到的。而低坝系统则是运用遥感技术首先从卫片上找到的。

2011年年初，通过一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副教授李旻给的良渚地区1960年代的美国corona间谍卫星影像和实地调

查勘探，我们发现了低坝系统。

间谍卫星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地面军事设施，阴影正是地表结构能在画面中凸显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都是倾斜拍摄的。其光影角度的选择正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同时，上世纪60-70年代本地区农村烧饭尚未开始使用液化气，村民都要上山砍柴，所以山体上植被很少，地形凸显。当时也还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原始地貌保存较好。

这张卫片画面呈长条形，西起余杭百丈，东到海宁许村，北达超山北侧，南部覆盖笕桥机场，所摄范围近1000平方公里。画面右侧是较大字体的编号：D86 079 表明这是卫星在轨运行到第86圈，拍的第79张照片。后面以小字体标注为S 11 FEB 69 1106-2 AFT，说明它的任务号是1106-2，由后部照相机拍摄，时间为1969年2月11日，正是自然植被很少的隆冬季节。影像分辨率很高，精度大约1.8米左右，根据解密信息，这是锁眼系列中第二代的KH-4B卫星所拍摄的。

查看此卫片，本意是查找有无遗漏的高坝。已经确认的坝体具有一个明显的形态特征：坝体一般分布在两个山体之间最狭窄的谷口位置，在卫片上看起来呈细长形，类似哑铃把手或者字母H中间那个短横。在一次的查看卫片过程中，焦点位置放得太靠下，忽然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看形状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



corona 卫片影像略图





卫片影像中的鲤鱼山

其东部为新 104 国道，再往东为栲栳山和南山。尤其是通过栲栳山居然连上了毛元岭和塘山！这就意味着，如果这是个良渚的坝，那它们和塘山就构成了一个整体！我们随即派出祁自立前往勘探。一天时间就证实那条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其东西两侧，还另有两条人工短坝！其中东侧一条已经被新 104 国道截断，西侧那条则非常短，卫片上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这三条坝，后来被我们命名为狮子山(东)、鲤鱼山(中)和官山(西)。



狮子山-鲤鱼山-官山现状(由北向南)

根据对卫片的进一步观察，又发现水坝系统有继续向西延伸的迹象，并在黄河头向北连接着大片的低丘，直抵高坝附近。在三个坝西面的后潮湾到黄河头之间圈出了 3、4 个新的疑似点。最终在梧桐弄根据钻探出的草裹泥得到了确认。

由此，南侧的这组水坝就被整体揭露出来，因为它们的坝顶高度大致在 10 米左右，我们称为低

坝系统。它们通过栲栳山、毛元岭等自然山体，最终和塘山连接，构成了南线的大屏障，同时通过西部低丘连接到与北部山谷间的高坝群。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塘山并非独立的水工设施，而是整个水利系统的一部分。至此，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框架基本显现出来。



高坝与低坝系统

水坝系统揭示后，判断其年代成为必然之举。在 11 条水坝中，塘山上部发现墓葬和玉器作坊，属于良渚文化无疑；其他坝体则都未经发掘，没有地层依据，坝体又都由生土堆筑，几乎不见遗物，所以我们更多要依靠以碳 14 手段进行绝对年代的测定。

2013 年夏，我们将 7 个水坝(当时梧桐弄尚未发现，塘山、官山无样本，岗公岭已测)共 15 个碳 14 样品送到北大检测。石坞样品有机质含量太低无法检测，其余 6 个坝共有 11 个样品得出检测结果，树轮校正后的数据全部落在 4700-5000 年之间，和所预料的一样，都属于良渚早中期。为了验证准确性，又将岗公岭的 2 个样本又送到日本年代学研究所测定，结果和北大的数据只差了十三年，证实这些结论准确可信。2017 年 7 月，我们再次将包括塘山、梧桐弄、官山、石坞、蜜蜂垄在内的所有坝体全部取样送北大检测，获得的 14 个数据全部落在 4900-5000 年间，具有高度一致性。

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良渚水利系统是距今近5000年时,统一规划和建设的水利系统。

2014年底,作为科技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邑子课题,我们撰写了《杭州余杭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考古》2015年第1期,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 四、意外之喜:水坝的发掘

水利系统中,塘山在1995年就被划入良渚遗址保护区范围内。而高坝系统和低坝系统则全部落在保护区外,面临着建设破坏的严重威胁,缺乏保护的法律法规。因此必须经过发掘提供科学依据,将其纳入文物保护的体系中来。2014年的一次意外破坏促使我们加速了对水坝的正式发掘。因此,2015年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发掘申请,拟对高坝和低坝各一个地点进行发掘。

由于通过仪器测定的绝对年代,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数据偏差,有时候甚至偏差极大。所以考古界传统上对单纯依靠测年手段来断代总是有所保留。在实际工作中,除了测年数据外,最好还能有地层关系可以互证。而良渚水坝普遍堆筑在生土之上,坝内也几乎没有陶片等可以断代的遗物,坝上当时也没有人类居住,往往只有汉代墓葬埋设其上,所以相对年代就只能界定为不晚于汉代,无法证明其属于良渚时期。所以发掘前我们不敢奢望找到精确的地层叠压关系作,而是以了解其内部结构堆筑方法和性状为目标。

2015年因104国道扩建,先由赵晔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在狮子山低坝区发掘290平方米,深度达5-6米,结果只在坝体内发现一小片良渚陶片,只能证明它不会早于陶片的年代。

主动性发掘,始于同年年底,由我领队,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具体实施,并延续到2016年。其中低坝系统选在鲤鱼山北侧,由南京大学黄建秋教授负责。高坝系统选在老虎岭,由山东大学郎剑

锋博士负责。

郎剑锋博士主持发掘的老虎岭坝体北侧原来因为民工取土,形成一个断坎,坎上暴露出草裹黄泥的痕迹,所以人工堆筑迹象非常明显。山大考古队分别在北侧断坎下和西侧与山体交界处布了两个探沟,并将整个断坎刮干净。结果在西侧探沟内,很幸运地发现了一个叠压在坝身之上的很小的灰沟G3。沟内发现的几片碎陶片,经过仔细辨别,是良渚晚期典型的T字形鼎足,侧扁足,盃足的残片,还有一块石刀的碎片。作为判定水坝相对年代的重要遗物,三块陶片被郎博士慎而重之的用锡箔纸单独包好,送给我看。这真可谓是“三块破陶片,改变世界观”!有了确凿的地层依据,就有足够的证据判断坝体堆筑年代不晚于良渚晚期,而测年数据显示老虎岭接近5000年,这样双重证据下,坝体属于良渚时期就确认无疑了。

#### 五、从隐于山野到闻达天下: 保护与申遗

2016年,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不仅荣获了2011-2015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也入选了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严文明先生在后者评选时点评到:良渚古城的十大发现以往已经评过很多了,如果是一般重要的遗址,就不会评给它了,但是良渚的水坝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原来有大禹治水的传说,现在良渚水坝比它还早了1000年,那不评给它,还评给谁呢?

同年5月21日在郑州举行的首届中国考古大会上,作为田野考古奖获奖项目,良渚水利系统项目做了大会演讲。由此,良渚水利系统正式在国际国内公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国际国内众多考古学家、水利专家纷至沓来,专程参观水利系统,都为良渚先民恢宏的规划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叹为观止。

而良渚水利系统的考古研究也在持续进展，相关的保护措施不断加强。

2017年1月，高坝和低坝系统正式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3月，国家文物局力主将水利系统纳入良渚申遗范围；

5月，杭州绕城西复线工程因避让水利系统而改线；

7月，良渚水坝的溢洪道确认，国内顶尖水利专家召开研讨会，确认良渚水利系统“具有拦蓄水功能，山间的天然隘口具有溢洪道作用，各坝组合形成了具有上下游两级水库的较完整的水利系统。”

我们深知，良渚水利系统很可能比我们今天所知的更为宏大，它也必将成为未来几十上百年内良渚考古的焦点之一。回顾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和认识过程，用我在考古大会上的获奖感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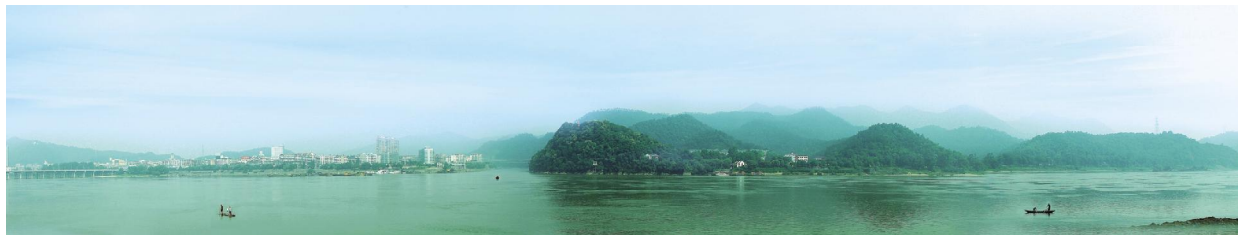
高坝、低坝形成的库区推测

为本文的结尾：

良渚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80载良渚考古“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见金”。四代考古人上下求索，终于吹去岁月的尘土，展现5000年的梦想与荣光！

(来源：浙江考古微信 2018年11月14日)





富春山居图 周保尔/摄

# 烟波百尺桐江好

□董利荣

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真是一条特别有意思的江,三个名字其实就是同一条江,此外还有浙江、渐江、之江等多个别名。而起止于建德梅城至萧山闻堰的富春江,在桐庐县境内段又有一个别称,叫桐江。

那么,桐江一词究竟起源于何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考证桐庐山水诗,最早的用法可以追溯到唐朝初期孟浩然(689~740)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我以为“桐庐江”即桐江的最早用法。孟浩然的好友大诗人李白(701~762)有“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的诗句,意思是说因为有严光隐居和谢灵运写诗,桐庐溪和临海峤都闻名天下。这里的“桐庐溪”即桐庐江。

此后,大概从谢灵运十世孙唐朝著名诗僧皎然(730~799)开始,“桐江”一词在山水诗中出现了。皎然写有一首五律《早秋思归示道谚上人》,开头两句写道:“桐江秋信早,忆在故山时。”从此,桐江一词便在桐庐山水诗中频繁出现。唐大和六年进士洛阳人许浑(788~860)写有《寄桐江隐者》一诗:潮去潮来洲渚平,山花如绣草如茵。严陵台下桐江水,解钓鲈鱼能几人。

唐朝咸通七年(866)进士汪遵有一首七绝,题

目就叫《桐江》,其中有“严陵何事轻轩冕,独向桐江钓月明”的句子。桐庐籍晚唐著名诗人方干也有“赢得桐江万古名”(《题严子陵祠》)等诗句。另一位唐朝著名诗僧贯休(832~912)则更是写了《桐江闲居作十二首》《春晚桐江上闲望作》《秋末寄上桐江冯使君》等多首以桐江为题的诗。之后以桐江为题的有宋朝淳化进士赵湘《桐江晚望》,元绛《桐江晚景》,张伯玉《秋晚舟泊桐江》,还有刘澜的《桐江晓泊》一诗写得十分精彩:风萧萧,冰瑟瑟,淡烟空濛冠朝日。滩头枯木如画出,鸚鹄飞来添一笔。

元朝有程钜夫《桐江钓台》,尹延高《桐江舟中》,吴师道《桐江道中二首》,何景福《桐江怀古》等。其中元朝历任监察御史、开平府尹、枢密副使的河南光州人马祖常写有《桐江》一首简约而内涵丰富:青山围县郭,碧树出旗亭,千里桐江水,分明是醪醑。

明朝有张宇初《桐江即事》,徐中行《入桐江》,郑渭《舟次桐江钓台》,王叔承《月夜下桐江闻孤雁》,许正蒙《忆桐江旧游》,吴扩《桐江夜泊》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吴延翰写有《夜过桐江二首》,第一首写得很有韵味:波光月色满船窗,七里滩头鸟一双。

欲问钓台飞不见,短簑吹笛下桐江。

清朝则更多,有周茂源《桐江晚眺》,祝秉贞《发桐江》,王佃《桐江舟中》和《桐江棹歌》,林兆斗《桐江舟中》,袁枚《桐江作(四首)》,毛升芳《桐江晓发》,徐道璋《桐江》,徐一麟《桐江道中》,周仪炜《桐江口号》,杨友声《桐江舟中》,许其光《桐江》,陈建举《桐江怀古》,高鹏年《题桐江渔隐图》等等。清末安徽歙县诗人江昉的七绝《桐江杂诗》写得很有意境:重冈复岭锁烟霞,林静风微鸟不哗。谁道仙源无路人,落红流出涧中花。

历代诗词中使用桐江一词的句子更是不计其数。诗中的“海潮也怯桐江净,不遣涛头过富春。”(宋·杨万里《甲午出知障州晚发船龙山暮宿桐庐》)“潇洒溪山梦此邦,轻风细雨过桐江。”(明·王祎《桐庐舟中》)“一路桐江尽胜游”(清·陶庆怡《送族子荆山经桐庐至严州》)“烟波百尺桐江好”(清·王楚堂《桐江留别》)“桐江山色天下无”(清·袁昶《大徐篆榜诗》)等句子和宋词中柳永《满江红》“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赵彦端《浣沙溪》“水到桐江镜样清”,辛弃疾《贺新郎》“望桐江,千丈高台好”等句子,都毋庸置疑地说明富春江最美的一段是桐江。清朝有“诗佛”之称的诗人吴嵩梁(1766-1834)甚至写下这样的诗句:“平生选诗梦,一半在桐江。”

不仅历代诗人喜欢用桐江之名作诗,历代画家同样常以桐江为题作画。如明朝陆治《桐江秋雪图》,明末清初邵弥《桐江归棹图》;近代萧瑟《桐江晓渡》,张大千《桐江七里泷》,谢之光《桐江》,刘侃生《桐江秋色》,应野平《桐江晓雾》,关山月《桐江小景》等。有“杭州唐伯虎”美称的唐云先生大概特别喜欢桐江,竟一口气画了《桐江清晓》《桐江山水图》《秋水桐江图》《桐江风光》《桐江小景》《桐江秋深》《桐江垂纶》等多幅桐江美图。曾寓居桐庐 10 年的中国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先生,也画有多幅以“桐江”为题的山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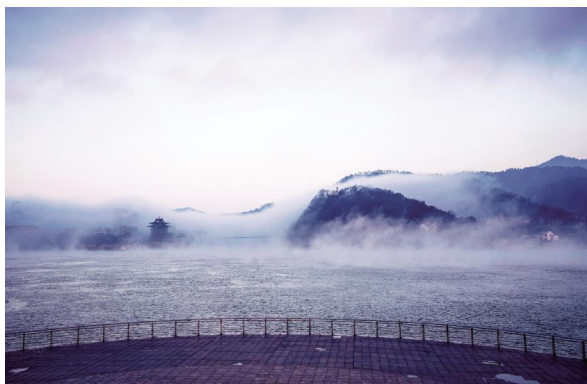
桐江一名,桐庐本地先贤也特别喜欢使用。编

纂文集常常用《桐江钓台志》《桐江钓台集》《桐江诗话》等。修编家谱更是冠以桐江地名,如《桐江方氏宗谱》《桐江华氏宗谱》《桐江赵氏宗谱》《桐江吴氏宗谱》等。桐庐县档案馆姚朝其编著的《桐分谱牒》一书中收入的家谱冠以桐江名称的竟然多达 68 部,可见桐江之深入人心。方干后裔方斫南宋时期在仙居建造一座书院,也取名叫“桐江书院”,这座历经 800 余年风雨的建筑如今依然是仙居县境内的一处重要人文景观。

近现代桐江名称也很常见。过去桐庐县城开元街上最大的餐饮店叫桐江饭店,其中“桐江醋鱼”是其招牌名菜。

“烟波百尺桐江好。”古往今来,人们都喜欢这段江,喜欢使用桐江这个别名。今日桐庐人更是精心呵护这一段江水,在历届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共同努力下,富春江在桐庐县境内段连续 12 年出境水优于入境水,也即上游进入桐庐境内的江水,经桐庐境域的保护净化,流出桐庐段界时,水质变优变好了。这可是省里权威机构检测并公布的结果。连续 12 年,久久为功,桐庐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呵!何以能如此,因为桐庐人对这条江爱得深沉,因为这条江的别名叫桐江。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钱塘江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桐江烟波 赵雄军/摄

# 海水和昆仑水： 女娲造人的鲁迅式表述

□倪浓水

## 一

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这个说法好。但是如果仅仅靠泥和水,还做不了人,需要将泥和水搅合在一起,才可以做成人。女娲就是这样“造人”的。《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代文献应劭《风俗通》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意思是说,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还没有人。女娲就抟黄土,捏出了第一个人类。接着又捏了几个,终于有点不耐烦了,同时也觉得这种捏人未免太慢,于是就用绳子沾着泥浆来甩,一甩就是一大批。他们都是人类的“原种”,有了这些“原种”,人类才开始繁殖起来。

这个“女娲造人”的故事,传了一代又一代,真真的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化常识。鲁迅也喜欢这个故事。他的《补天》(原名《不周山》),就是从“女娲造人”开始写起的。

但是鲁迅的“女娲造人”,与应劭《风俗通》里的“女娲造人”,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造人所需要的“水”和泥的不同。

这是海水与昆仑山水的不同,是海泥与黄土的不同。

## 二

女娲造人需要水,那是肯定的。因为如果没有水,黄土无法“抟”,也无法“捏”,干燥的黄土根本无法成形;如果是“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那就

更需要水了。“举”就是“甩”,把绳子放在泥中,甩向空中,无数的泥点,成就了无数的人,这里的泥,必定是湿的,属于泥浆之类,因为如果是干泥,是甩不起来的。

那么在神话的原本故事里,或者叫“本事”中,女娲造人用的水,究竟是什么水呢?应劭在《风俗通》里没有解释,《太平御览》引述这个故事后也没有加以“旁注”。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整个故事的语境,予以分析。

故事说,女娲造人用的是“黄土”,这个“黄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所谓“黄土”,并非是简单的“黄色的土”之意,而是一个专门的地理概念。在我国的黄土和黄土状地域,主要分布在昆仑山、秦岭、泰山连线以北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所以可以将“黄土”理解为“内陆”,而且是特指西北部内陆山西、陕西、甘肃东南部和河南西部一带的“黄土高原”以及青藏高原中的昆仑山一带。

把“黄土”理解为内陆,或者干脆直接理解为昆仑山区一带,我们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证据,那就是“女娲补天”的地点。

关于“补天”的神话,见于《列子·汤问》:“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这个故事后来又被《淮南子·原道训》所引用,内容差不多,都是说,天地形成后,虽然在初期阶段,有点破漏,但是女娲用“五色石”把它补好了,



女娲还用鳌鱼的足当作四极，不但彻底分离了天地，还使天地立得四平八稳的。现在之所以形成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是由于被共工氏撞断了天柱，与女娲无关的。

那么女娲补天的地方在哪里呢？故事也没有直接点明。但是故事点到了“不周山”。那么这“不周山”又在哪里呢？《淮南子·原道训》有后汉学者高诱的注释。高注说，这“不周山”的具体位置，在“昆仑西北”。

昆仑即昆仑山。在神话话语里，它是“帝之下都”，是诸神居住的地方。《山海经·西山经》说：“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可是它又是一座实际存在的高山，在中国西北极苦寒之处。“不周山”在昆仑山的西北方向，说明更是遥远的所在了。所以说，在神话“本事”里，女娲“补天”的地方，是在深深的内陆地区昆仑山一带。

关于昆仑山一带，是女娲补天的地方，其实鲁迅也是赞同的。他的《补天》里就有这样一句话：“这时昆仑山上的古树林的大火海没有熄，西边的天际都通红。”女娲就借用了这火种用来补天。

可见昆仑山是女娲居住的地方，是她补天的地方，由此也可以推测，也是她造人的地方。

那么我们的结论也就可以产生了：在神话语境里，女娲造人的地方，在昆仑山一带，她所使用的泥土，是内陆的黄土；所使用的水，是昆仑山下的水，是内陆的湖水，是淡水。

### 三

可是到了鲁迅的《补天》里，“水”和泥，却完全变了。

它成了“海水”，成了海泥。

鲁迅的《补天》，是这样描述“女娲造人”的：

“伊……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二精力洋溢的胳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奇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

成一段纯白。……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下，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在鲁迅《补天》的叙事里，女娲是“走”到“海边”和“海洋”里的。她原先睡觉、醒来、感到“无聊”和压抑的地方在哪里？《补天》没有明说，但是鲁迅用了“天地间”这个空间概念。对于这个空间，鲁迅是这样描述的：“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这个“天地见”，天自不必说，而“地”则是由“熔岩”、松柏和无边无际的“杂花”所组成，这分明是广袤的内陆大地。可见在叙事的开始阶段，鲁迅遵循了“女娲造人”素材“本事”中的“黄土”因素，但是当女娲从黄土大地上醒来、感到“无聊”后，萌发了“生命”的冲动。她采取的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内地“走”到了“海边”，然后让自己“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也就是说她的“生命”之躯已经进入了大海之中。

她到“海洋”中干什么？是为了让清凉的海水冷却自己的“创造”和“冲动”之火吗？不是的，或者是恰恰相反，海水更加刺激了她的生命力的冲动。“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这是对于“海洋”的匍匐，是女娲“造人”前的一种顺从。她用带着海水的海泥，“造”出了第一批人类，后来又用紫藤沾着海泥，甩出了无数的“小东西”来。

在“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语境里，女娲“造人”的地点是在远离海洋的黄土陆地，但是在鲁迅的再创造文本里，女娲造人的地点，由“黄土陆地”变成了“海边”，鲁迅就这样改写了“女娲造人”的神话，或者说重构了“人的缘起”。

鲁迅不但将女娲“造人”的地方改造成海里，而且还将“补天”的地点，也从昆仑山下改成了海边。

在《补天》里，鲁迅这样写道：“情形很不清楚，遍地都是瀑布般的流水，大概是海里罢，有几处更

站起很尖的波浪来。”

这说明,在小说《补天》叙事体系里,“补天”话语仍然延续“女娲造人”的“海洋语境”。当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时候,刚刚完成了“造人”杰作的女娲,仍然还留在“海边”。

女娲“造人”被改在海边,其“补天”也改在海边,最后力竭而死,仍然是在海边。

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海水,海水!

这是东海的水。《补天》第三部分写了海上神仙岛故事。有关海上神仙岛的传说,也来自于《列子·汤问》:“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鲁迅在他的《人之历史》一文中,曾经引用了屈原《天问》“屈灵均谓‘鳌载山抃,何以安之’”一句。汉代王逸注《天问》对此句的解释,引述的是刘向《列仙传》的有关记载:“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文中的“抃”,是鼓掌的意思,“抃舞”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指的是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在海上载歌载舞,非常兴奋。可见:鲁迅在《补天》里所添加的海洋,具体是指“东海”,因为在神话故事里,“蓬莱之山”就在东海里。

东海是鲁迅的故乡。

#### 四

鲁迅的故乡绍兴位于东海边上。虽然在鲁迅出生和生活的年代,由于海岸线的内移,绍兴与大海之间有一点小距离了。但是在文化属性上,以绍兴为代表的越文化,是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质的。《越绝书》就记载说绍兴一带的于越地区,“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

鲁迅对于海洋是非常熟悉的。在《故乡》里,他写到过小时候与闰土一起在“海边”玩。在《阿长与〈山海经〉》,也写到过更小的时候,为了躲避“长毛”,全家“都逃到海边去了”。后来留学日本,

多次横渡大海,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区域中,广州和厦门都是海滨城市和海洋城市,他后半生定居的上海也紧邻海洋。

当然,更主要的是,鲁迅对于女娲造人空间的改变,具有深刻的科学依据。因为科学证明,一切生命都诞生于海洋”。

1907年,鲁迅写了一篇《人之历史》,着重介绍和评价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黑格尔)《人类发生学》(即《人类种族的起源和系统论》)。在该文中,鲁迅这样介绍“人类的起源”:“海克尔著《人类发生学》,则以古生物学个体发生学及形态学证人类之系统,知动物进化,与人类胎儿之发达同,凡脊椎动物之始为鱼类,见地质学上太古代之侏罗纪,继为迭逢纪之蛙鱼,为石炭纪之两栖,为二迭纪之爬虫,及中古代之哺乳动物,递近古代第三纪,乃见半猿,此生真猿,猿有鹰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语,降而能语,是谓之人。”

这说明早在《补天》写作15年前,鲁迅就已经知道并且赞同“人类诞生于猿,猿来自于哺乳动物,哺乳动物从爬虫发展而来,爬虫从两栖动物进化而来,两栖动物脱胎于鱼类,鱼类产生于海洋”的进化观点。这种观点就是现在所说的“一切生命都来自于海洋,人类也不例外”的科学结论。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补天》描述女娲在海里“造人”,“造人”材料(泥和水)来自于海洋的“神话重建”,是有扎实的科学依据的,也是与鲁迅一贯的进化观点相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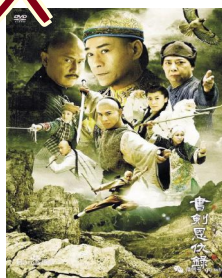
《人之历史》是鲁迅用“力求完整谨严地把握古今中西文化某一主题的论述方式”写成的学术论文,《补天》是文学创作,但是在“人的缘起”的问题上,两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说明尽管是“故事新编”,其实鲁迅是抱有很认真的科学态度的。或许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所说的起初创作《补天》的时候,“是很认真的”,这里的“认真”,指的就是这种科学性的态度吧。

(作者: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武侠江湖深嵌 故乡情结

□ 崔 然



2018年10月30日,新派武侠一代宗师金庸离开了,享年94岁。

他的武侠小说,曾经陪伴了无数中国人的成长。记得小编当年读初中时,暑假的漫漫长日,很多时间也都是沉浸在他的小说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句话描述的是金庸最出名的15部武侠小说,分别是《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雪山飞狐》《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越女剑》。

金庸旧居坐落在海宁市袁花镇新伟村一组(赫山房)查家,查家在清代“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被康熙皇帝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海宁历来是观潮圣地,出生在海宁袁花赫山房的金庸,离观潮胜地盐官镇只有10数公里,童年时几乎每年农历八月十八都要跟母亲去看大潮。此外,从老人口中听到盐官古镇内陈阁老宅有关乾隆皇帝被掉包的野史,对一个好学的小孩,这故事可说倒背如流。

野史流传说,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的儿

子。雍正皇帝生了个女儿,用调包计换去了陈家的儿子,乾隆实际上是汉家的血脉,这传说越数百年而不衰,从小铭刻在金庸的心里。故事轮廓由此而来,从家国恨到儿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开。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

从1946年11月23日起,“对新闻事业抱有浓厚兴趣”的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开始做外勤记者。金庸笔下提及的不少风景名胜都发生在杭州,也让居住在杭州的我们感到特别亲切。他书中的武侠江湖深嵌了故乡情结,其中钱塘江数次在小说中出现,《射雕英雄传》从牛家村开始,牛家村就在钱塘湖边;《倚天屠龙记》借武当七侠之一的俞岱岩之眼写到了钱塘潮;而描写钱塘潮最为细致的当属《书剑恩仇录》。

## 一、《射雕英雄传》描写钱塘江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



在大江边，乌桕树叶子似火般烧红，斜阳下的村落里，有老人敲着羯鼓在说书。

## 二、《书剑恩仇录》第八回描写了钱塘江

### ●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涌动万乘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

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乾隆左手拉着陈家洛的手，站在塘边，右手轻摇折扇，骤见夜潮猛至，不由得一惊，右手一松，折扇直向海塘下落去，跌至塘底石级之上，那正是陈家洛赠他的折扇。乾隆叫了一声“啊哟！”白振头下脚上，突向塘底扑去，左手在塘石上一按，右手已拾起折扇。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眼见白振就要披卷入鲸波万仞之中，众侍卫齐声惊呼起来。白振凝神提气，施展轻功，沿着海塘石级向上攀越，可是未到塘顶，海潮已经卷到。陈家洛见情势危急，脱下身上长袍，一撕为二，打个结接起，飞快挂到白振顶上。白振奋力跃起，伸手拉住长袍一端，浪花已经扑到了他脚上。陈家洛使劲一提，将他挥上石塘。

这时乾隆与众侍卫见海潮势大，都已退离塘边数丈。白振刚到塘上，海潮已卷了上来。陈家洛自小在塘边戏耍，熟识潮性，一将白振拉上，随即向后连跃数跃。白振落地时，海塘上已水深数尺，他右手一挥，将折扇向褚圆掷去，双手随即紧紧抱住塘边上一株柳树。

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霎时之间已将白振全身淹没波涛之下。

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

### ●钱塘江畔陈家洛见乾隆

乾隆哈哈大笑，说道：“你总是眼界太高，是以至今未有当意之人。这块宝玉，你将来赠给意中人，作为定情之物吧。”玉色晶莹，在月亮下发出淡淡柔光，陈家洛谢了接过，触手生温，原来是一块异常珍贵的暖玉。玉上以金丝嵌着四行细篆铭文：“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乾隆笑道：“如我不知你是胸襟豁达之人，也不会给你这块玉，更不会叫你赠给意中人。”这四句铭文虽似不吉，其中实含至理。

## 三、《倚天屠龙记》第三回描写了钱塘江

### ●宝刀百炼生玄光

那船张起风帆，顺风顺水，斜向东北过江，行驶甚速。航出里许，忽听远处雷声隐隐，轰轰之声大作。俞岱岩道：“艄公，莫非要下雨了？”那艄公笑道：“这是钱塘江夜潮，顺着潮水一送，转眼便到对岸，比什么都快。”俞岱岩放眼东望，只见天边一道白线滚滚而至。潮声愈来愈响，当真如千军万马一般。江浪汹涌，远处一道水墙疾推而前，心想：“天地间竟有如斯壮观，今日大开眼界，也不枉辛苦一遭。”

### ●《倚天屠龙记》还有其他几处也写到钱塘江

那剧盗听到风声，立时潜藏隐匿，俞岱岩费了两个多月时光，才找到他的秘密巢穴，上门挑战，使出师传玄虚刀法，【在第十一招上将他杀了】。本来预计十日可完的事，却耗了两个多月，屈指算来，距师父九十大寿的日子已经颇为逼促，因此上急急自福建赶回，这日已到浙东钱塘江之南。

其中还有一段写殷素素在钱塘江上偷袭俞岱岩：天鹰教教主之女殷素素，为夺得屠龙刀，在钱塘江上假扮船家偷袭身携屠龙刀的武当俞三侠俞岱岩，她将暗器“蚊须针”射入俞岱岩胸腹和大腿，再将“七星钉”穿入他掌心。最终俞岱岩因毒性发作，昏过去。

（来源：钱塘江文化微信 2018年10月31日，文题有缩减）

丽水古堰画乡管委会供图



## 千秋通济堰

□鲁晓敏

距离丽水市区西南 28 公里处,坐落着一座外表看似平静的古村落,一条渠道从村中流淌而过,清清亮亮的水流映照着古雅的街巷、高挺的石牌坊、陈旧的文昌阁、斑驳的石桥,这一切构成了浓郁水乡情调的堰头村。

成群结队的古樟簇拥在渠道的外侧,如同竖起一道庞大的墙体,遮挡了天地,也将盛夏屏蔽在外,整座村落荡漾着习习凉风。一阵阵匆匆的响声由樟林外远远近近地逼来,逐渐在村落上空回旋,激荡,澎湃。沿着驿道前行,樟林穷尽处,宽阔的松阴溪水在眼界之间天然降临,平整的溪流流经村头时仿佛受到神力的阻挡,轰然间,断裂成高低两截平面。及近而看,一道堰坝隐没在水下,隐约显现出一条弧形的脊背,阻击着前呼后拥而来的滚

滚波涛,一股股激流飞涌喷泄,纷纷扬扬,飘飘洒洒,整片区域笼罩在蒸腾的水汽中,空气中飘荡着一丝丝黏稠的气息。

这道黑漆漆的脊梁,就是有着 1500 年历史的通济堰。它在水中矜持地蛰伏着,将自己的身段压在激流之下,成了溪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让人忽略它的存在。站在松阴溪畔,南朝的风还贴着耳鬓呼啸,1500 年的通济堰在时间中有序地流传着,完整如初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如此遥远的建筑至今仍然功能完好的实属凤毛麟角,远远地超越了时代界限,也只有像通济堰这样谦卑而又顽强的生命,才能把握和巩固着自身的价值。

在通济堰一侧,现存一座詹南二司马庙,庙里立着 22 方字迹漫漶的碑文,记录着詹南二司马、



关景晖、范成大、何澹、樊良枢、刘延玠等历代官员主持修堰的政绩。南朝萧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持的大规模修堰行动拉开了序幕。透过这些碑文，我依稀辨别出先人们的身影，他们的身影在字迹下扭动起来，渐渐地聚集，合成一场盛大的劳动场景：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高亢、绵长的号子从松阴溪河床上响起，施工现场一片宣扬，一群体魄强健的先人，正在奋力地劳作着，他们将石块填塞进竹框，再将竹框累积成一方庞大的坝体。丰收的祈盼化作劳动的感召，他们一路排开，从坝底到坝顶，从干渠到支渠，一片忙忙碌碌。指挥修堰开幕式的是詹南二司马，他们挥动着令旗，拉开了通济堰水利工程的千年征程。

历经千辛万苦，一道轻巧的抛物线落在了松阴溪上，它没有伟岸的身姿，它恰恰是丽水先民智慧和毅力的杰作。摊开碧湖地图，我清晰地看到碧

湖盆地形同一只巨大的容器，通济堰就是容器的入口，水在这里从天然走向规则，从肆虐走向秩序，汨汨注入碧湖盆地，流淌过一座座村落、一户人家、一垄垄田亩。这些昼夜不舍的水流，被先民收伏，一千多年来，它尘俗不惊，默默地滋养着这片土地。

通济堰是一个以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由大坝、进水闸、石函、淘沙门、渠道、大小概闸、湖塘等组成。拱形大坝长275米，宽25米，高2.5米，拱坝的科学设计减弱了水流对堰坝单位宽度的冲击力，从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抗洪峰能力。拱坝改变了水流方向，使溪水沿拱坝圆心方向泄流，有效地减轻了对堰坝护坡、溪岸的冲击。只是先民们没有料想到，这条千辛万苦修筑而成的大坝，竟然是世界上最早的拱形大坝！济堰布局成竹枝状灌溉网，22.5公里的干渠上分凿出48条支渠、321条毛渠，通过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大小概闸



丽水古堰画乡管委会供图



调节分流及利用众多湖塘水泊储水，形成以引灌为主，储、泄兼顾的竹枝状水系网。与通济堰与都江堰、郑国渠等著名的水利工程相比，通济堰的灌溉网络结构更加科学合理。

为了破解山涧水流冲击干渠而造成堵塞的一难题，北宋政和元年（公元 1111 年），通济堰上建造起一座立体交叉的石函引水桥，上层通行人，中层导流溪水，下层引流渠水，避免了泥沙堵塞，使得堰渠水流畅通无阻。这次看似不起眼的改造工程，又为通济堰夺得了一项桂冠——世界上最早的“水上立交桥”！

先民们利用碧湖盆地落差地势营建通济堰，从而基本实现了自流灌溉，一条条堰河，一道道沟渠，仿佛一条条细密的毛细血管从大动脉中衍生

开来，滋养着 3 万亩良田。他们熟稔了松阴溪的脾性，他们随波逐流，将桀骜不驯的松阴溪收伏得顺顺当当。当年旱涝无常一去不复返，人丁兴旺，谷物丰茂，万物竞生，出现了年复一年的丰收盛景。

今天，通济堰依旧发挥着最古老又是最实在的灌溉功能，无论身处任何时代，面临任何环境的变迁，它依旧焕发出生命的芳华。环顾中华大地，当一条条名堰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之际，通济堰成为我国五大古堰中仅存的一座功能齐备的古老灌溉体系，成为一处活着的水利标本。它在奔腾的松阴溪中，划出一道隽永的音符，在历史长河中奏响千年不息的交响乐章……

（作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邹金清/摄

# 白鹭洲

□练云伟

我家的阳台外是一座公园,公园里有许多红木做的亭子,亭子周围种有冬青、木荷、栀子、月季等花草,还有一排翠绿的香樟树。公园外是东西走向的浮云溪,浮云溪中散落着一些由河水冲积形成的沙洲,沙洲上长满了芦苇、马鞭草之类的植物。春夏之交,沙洲上的芦苇便会吐出雪白的芦花,只要有一丝风,芦花便四处飞舞,然后栖息在沙洲上,白茫茫一片……

今年春天,浮云溪飞来一群鸟。这是一群白色的精灵,尖嘴、长颈、白羽、细足……,它们时而栖在沙洲的草地上,时而隐于芦苇丛中,时而盘旋在湛蓝的天空,时而飞掠于清澈的水面,自由自在,无比惬意。

我不知道这群白色的精灵叫什么名字。一日,有朋友来我家小聚,当他在阳台上看见浮云溪上飞翔的白色精灵时,失声惊叫“好漂亮的白鹭”。这时,我才知道,这群不知疲倦飞翔的精灵原来拥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白鹭。我还从朋友那里得知,白鹭是重要的湿地鸟类,对环境要求较高,是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

就这样,白鹭不知不觉走进我的生活,只要站在阳台上,或者坐在书房里,鹭群总是在我的视线中来来往往、忙忙碌碌。而且我发现,浮云溪一带的白鹭越聚越多,鹭群越来越庞大,鹭阵越来越壮观。

“白鹭洲!”有一天,我脱口而出,很有诗意地把白鹭与沙洲这两个意象紧紧地糅合在一起,脑子中随即出现了“兼葭苍苍,白鹭为霜”的



邹鑫清/摄

古典意境。

白鹭的光临,为浮云溪、为我居住的这座山城增添了一道风景,注入了一丝韵味,让山城平添不少灵性。每天,来溪边看白鹭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一些摄影家,他们把镜头对准白鹭,把白鹭的一翅一羽、一栖一飞定格成永恒。

白鹭让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感到非常欣慰,在我们看来,飞翔的鹭群是一幅移动的风景,它们在我们的窗外美丽飞翔,偶尔也有大胆的,停在我们的阳台上。儿子天性爱鸟,他常常在阳台上放一些鸟食,当白鹭前来啄食时,他便躲在屋内,远远地看,生怕惊走了这来自大自然的“天使”。

在我家阳台的对面,在溪那边一家农户的阳台上,也有一位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每天都倚在栏杆上,聚精会神地看着鹭群飞翔或者停栖……

一天夜里,我正在书房看书,窗外下着大雨,气象预报说是台风过境。透过雨声,我隐约听见

阳台上鸟的哀鸣声，一声声凄凄惨惨，如泣如诉。我来到阳台，打开灯，被眼前的一切怔住了。我看见一只白鹭正站在阳台的栏杆上，低垂着头，眼里充满了忧伤，湿漉漉的羽毛贴在身体上，细长的左腿裂开了一道口子，鲜血一滴一滴滴在阳台的花岗岩上。

我翻箱倒柜，找来了一块红布条，一瓶碘酒，还有一些未用完的云南白药，重新来到阳台，试探着抓住这只白色的精灵。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白鹭并没有拒绝我，我很容易就把它捧在了手里，随后给它擦洗伤口，上云南白药，再很小心地在伤口处扎上了红布条，然后用干毛巾，一点一点吸干它羽毛上仍点点滴滴挂着的水珠。我把这只受伤的白鹭放在一只纸箱里，试图让它躺下或者卧下，可它却坚持站着，用受伤的腿支撑着身体，而头则探出纸箱，一双眼睛在雨夜里搜索着……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在浏览一份晚报时，意外地看到了刊登在头版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打着醒目的标题：《重新飞翔》。画面中，一只白鹭正在沙洲上空展翅飞翔，细长的左腿上绑着一块随风飘扬的红布条，格外醒目。照片下配有文字说明，大意是说这是一只受伤的白鹭，因为受到好心人的救助才得以重新飞翔，还借机呼唤人类爱护鸟类，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生态文明。

看到这幅照片后，连日来一直悬在我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可以肯定，那只重新飞翔的白鹭腿上绑着的红布条，就是我亲手扎上的，我从心里祝福它，它终于挺住了，它终于重新飞翔了，飞翔在自由的天空！但我却对那些文字说明不以为然，因为我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这么崇高，能达到“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无论是我还是你，当一只鸟很无助地望着你时，我们都不会考虑很多。

当然，媒体的宣传是很有效果的，它往往能唤醒人类的社会责任感。在《重新飞翔》照片刊出的第二天，我在阳台上看到，白鹭洲一夜之间树起了一片小树林，每棵树的枝桠上都筑有一只鸟巢，鸟巢上面盖着银白色的布料，既遮阳又挡雨。

正当我惊讶于这片人工林，惊讶于这些鸟巢时，一群白鹭轻轻地落在树冠上，四处张望一番后，踮起细细长长的腿，一只一只钻进鸟巢。我想，这些白色的精灵也许是飞累了，要在鸟巢里稍作休息，也许是到了繁衍后代季节，便迫不及待地寻找一个家。不管怎么样，我可以断定，这群白色的精灵，并不拒绝人类的赐予。

后来几天，我经常站在阳台上注视着白鹭洲，目光在起起落落的鹭群中寻找那只受伤的白鹭。不管我如何努力探寻，我还是没有发现那只左腿上扎着红布条重新飞翔的白鹭……

一天早起时，我像往常一样来到阳台，放眼白鹭洲，白鹭洲上浮着一些水雾，水雾中，我隐约看见一团白色的东西躺在草丛中，好像一只鸟。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心头，我冲下楼去，冲向早晨的白鹭洲！到达白鹭洲时，我惊呆了，一只白鹭静静地躺在草地上，眼睛紧闭着，已经没有了气息，左腿上还扎着一块褪了色的红布条，而右腿却扎着一块崭新的蓝布条。

“叔叔，小白鹭还会不会再飞起来？”

这时，传来一位女孩的哭泣声。我转过身，女孩正跪坐在不远处的草地上，我发现，她正是每天都倚在溪那边的阳台上看鹭群飞翔的女孩，女孩头上扎着一只蓝色的蝴蝶结，眼里充满了忧伤，身后的草地上躺着一支拐杖……

（作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 组 · 诗

□李俏红

### 遇见湘湖

在一幅水上写字  
于我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湖里荡漾着的岁月  
已经让文字失去了意义  
天空对大地包容  
时空对世界无垠  
如此旷远的年代  
水知道

跨湖桥的遗址  
水墨画般地在眼前低调地铺展  
越王勾践的古城墙 散尽销烟后  
在湖面留下美丽的倒影  
那只世界上最古老的独木舟啊  
恍如奇迹般的神来之笔  
在湘湖的波中那么轻轻一晃  
就把浙江文明史向前推了八千年

湖面上 一群梦幻般的飞鸟  
轻轻地掠过树梢  
悠悠回旋在天际  
年轻的心跳穿越了久远的年代  
融入烟峦波光深处  
众多的传说在这儿有着不同的版本  
范蠡是否真的泛舟湖中  
荷花深处是否有西施的身影  
桥旁渔侧是他们在施善乡梓吗

“卧薪尝胆”、“程门立雪”  
一汪碧水 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  
晨起 我看见游鱼在水草间穿梭  
暮合 我听见晚钟在月色里悠扬  
风情万种的湘湖啊 波光荡漾  
于是 我忍不住加了一笔  
让贺知章那株万条绿丝绦的柳树  
在二月的春风里细细地栽

## 婺江

从诗经的清晨走出去  
在宋词的黄昏里回来  
婺江的每一段  
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双溪、西溪、沙溪、太子溪  
仿佛一夜之间  
这些好山水就从画中  
走到生活里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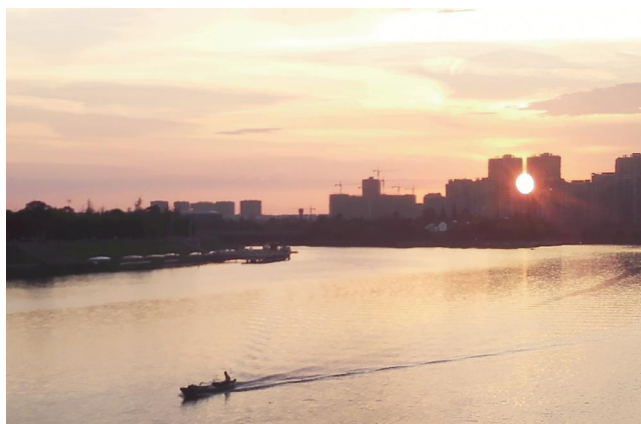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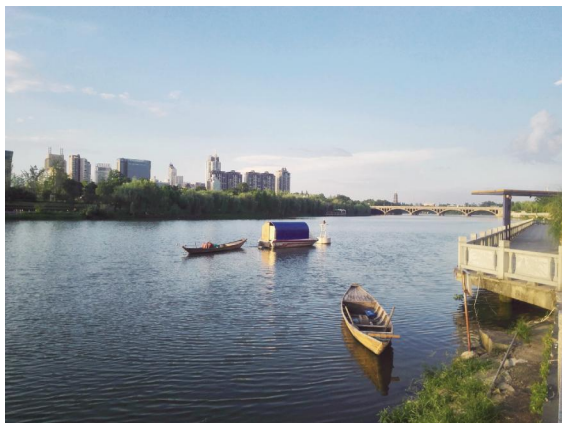
在江边散步 俯仰之间  
我闻到婺江温柔的水气  
几千年的婺文化  
在水气里蒸腾酝酿  
微风过处  
我干枯贫瘠的灵魂  
被清澈的江水一涤  
欣欣然恍若春天

## 舴艋舟

这一场秋雨下得多么奔放  
婺江的水马上满了起来  
不知哪个好事者  
在河盘桥和双龙大桥之间  
放了一叶舴艋舟

小舟随着流水起起伏伏  
空着  
一如那些呼啸而过的日子  
满着  
一如舟中永远载不动的清愁

(作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 经严陵钓台

□杜荀鹤(唐)

苍翠云峰开俗眼，  
泓澄烟水浸尘心。  
惟将道业为芳饵，  
钓得高名直到今。

## 渔 浦

□常 建(唐)

春至百草绿，陂泽闻鶉鷓。  
别家投钓翁，今世沧浪情。  
沤纆为缁袍，折麻为长纓。  
荣誉失本真，怪人浮此生。  
碧水月自阔，安流净而平。  
扁舟与天际，独往谁能名。





## 征 稿 启 事

《浙江水文化》是经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由浙江省水利厅主办、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承办的内部刊物(季刊)。旨在传承和发扬优秀、丰富的水文化,增进水利及相关行业、部门的相互沟通了解,传达人水和谐的理念,为水文化研究、宣传和 Education 服务。主要刊登水政读解、水事典型、水文化研究、水史抉微、河海湖塘纪事、涉水文学艺术等题材的文章,主要文类有调研报告、学术论文、人物专访及文学艺术作品等。本刊以浙江水文化为重点,兼及国内外水文化研究成果,以学术性为特色,兼顾新闻性和艺术性。本刊从 2018 年第 1 期起作改版,现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不吝赐稿荐稿;特别欢迎原创首发稿件,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本刊准印证:浙内准字第 0235 号

《浙江水文化》杂志主要设以下栏目:

**一、卷首语**——每期 1 篇文章,800-1000 字左右,每期 1 题。

**二、理论前沿**——每期刊登 3-5 篇文章,每篇字数在 3000-5000 字(含有关领导的署名文章)。

**三、水事动态**——每期刊登 6-8 篇文章,每篇字数在 1000-3000 字,主要反映全省各市县水

利、水文化建设动态。

**四、学术论坛**——每期刊登 3-5 篇文章,每篇字数在 5000 左右。特有影响力的文章篇幅可酌情而定,主要刊登具有基础性、当下性,能反映学术前沿动态的水文化研究成果。

**五、水利纪事**——每期刊登 3-4 篇文章,每篇字数在 1000-3000 字。主要刊登反映海塘、河湖、水库、海洋等水域的历史文化类文章。

**六、文化鉴赏**——每期 2-4 例,主要刊登涉水遗产(遗迹),图文并茂。

**七、水韵艺海**——每期刊登若干篇(幅)诗文、书法等,篇幅长短皆可,但不宜过长。主要刊登国内外名家相关诗文、书法及当下有关原创作品等。

**八、人物专访**——每期精选 1-2 人作为访谈对象,主要刊登全省各地在水利、水文化建设、水文化传承与保护等领域涌现的感动人物的访谈文章。

因人力有限,为便于沟通,诚请投稿者写明第一作者的真实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学位、职称、所从事的工作或研究方向、联系电话、所在单位全称及通讯地址等。来稿刊发后,将按规定付给稿酬,并赠送当期期刊 2 册。

编辑部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府街(二号大街)508 号

电子邮箱:zjsw@zjweu.edu.cn

邮政编码:310018

电 话:0571-86926376 0571-86927155